

嘉善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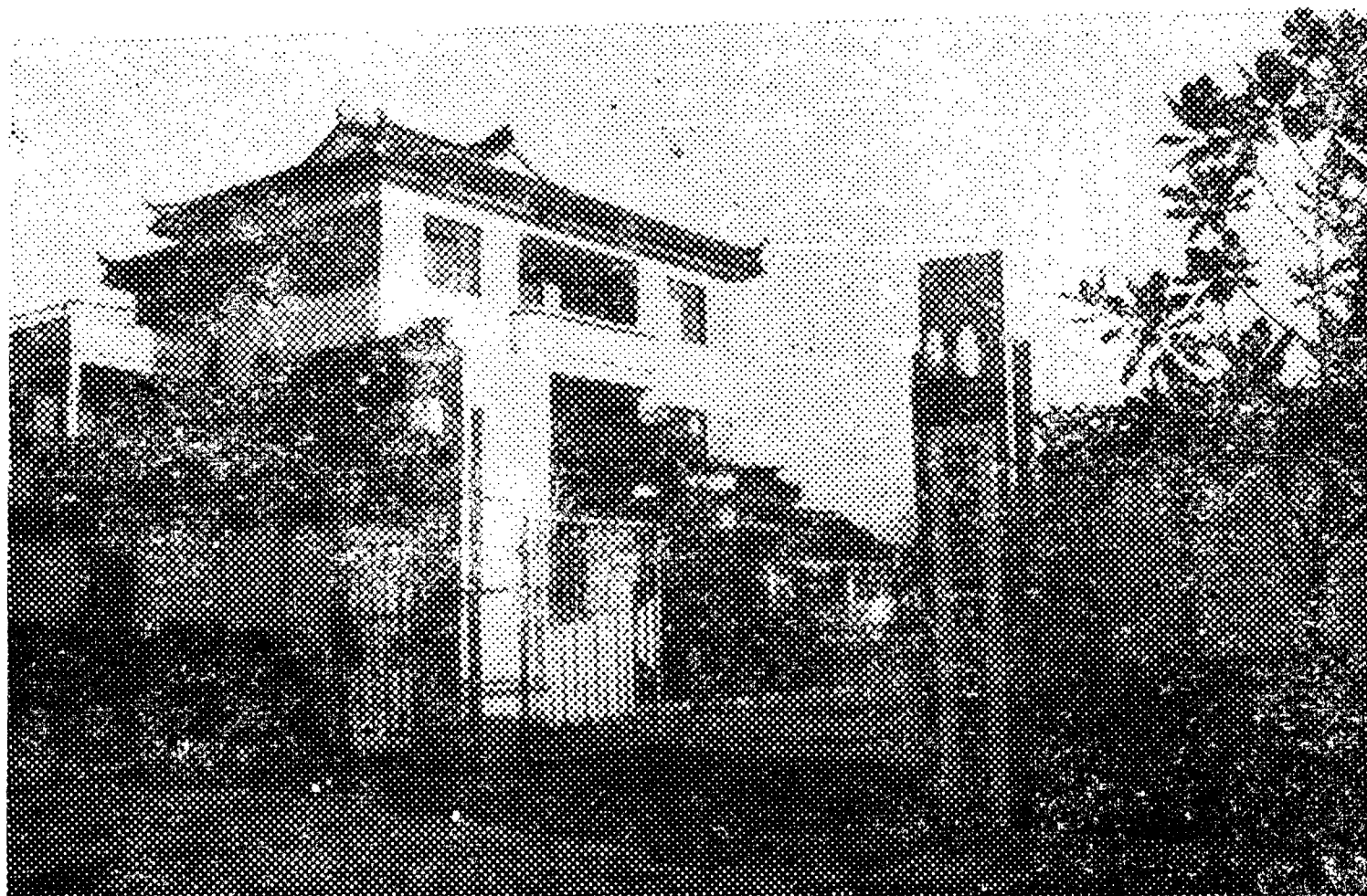


选辑(二)

政协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

102.22
H4
.2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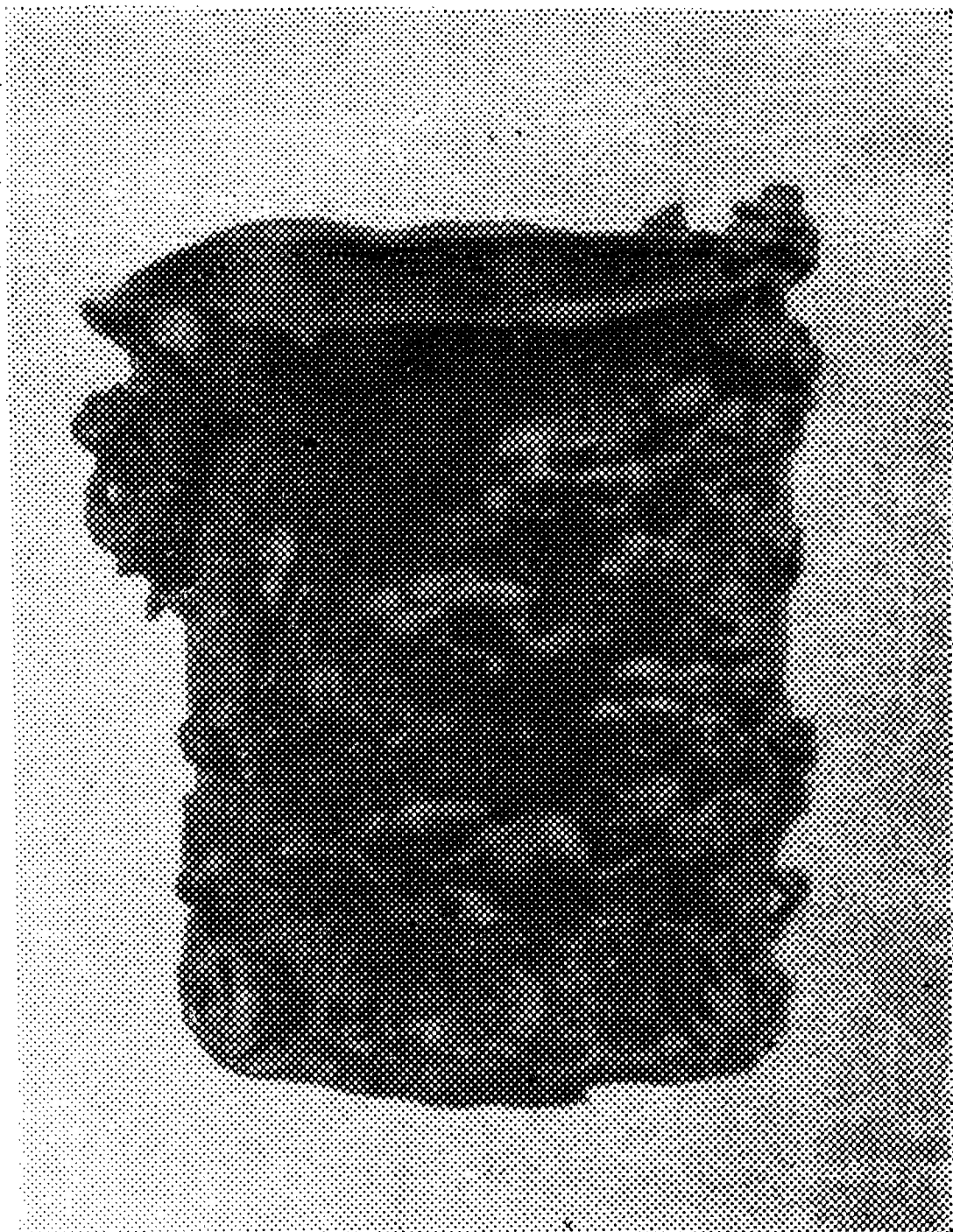
政协嘉定县委员会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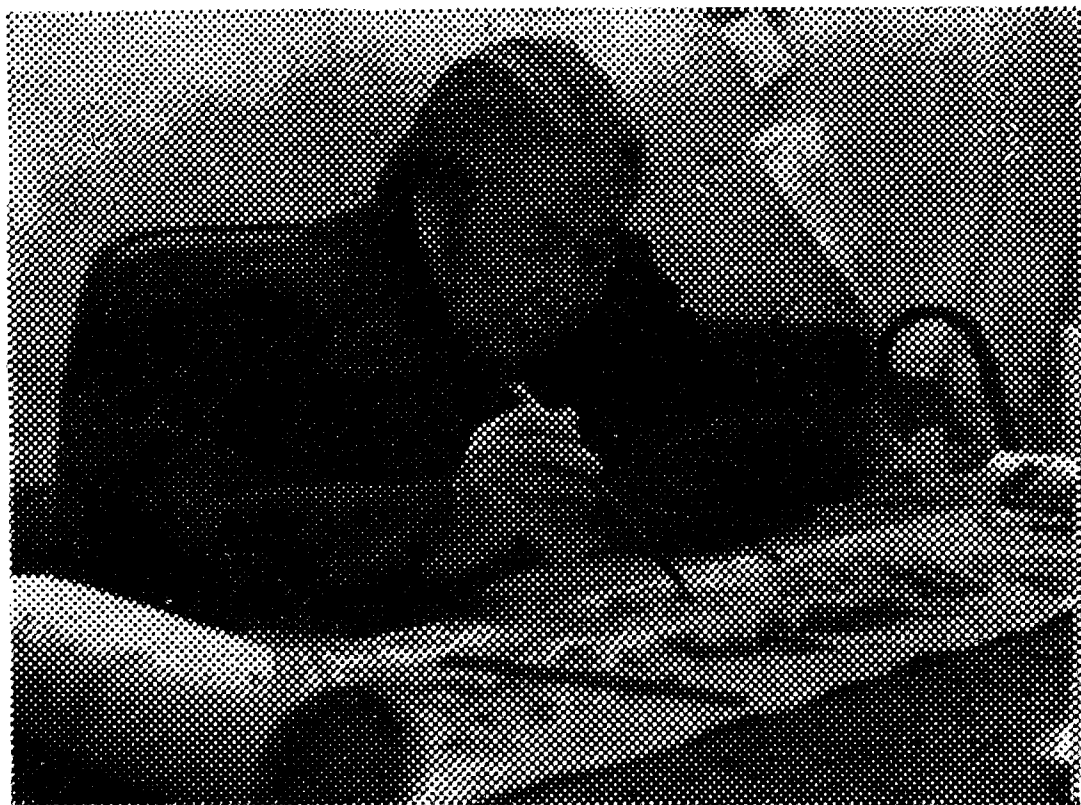
张崇虎摄



杨卫玉遗像

朱鹤深雕松鹤笔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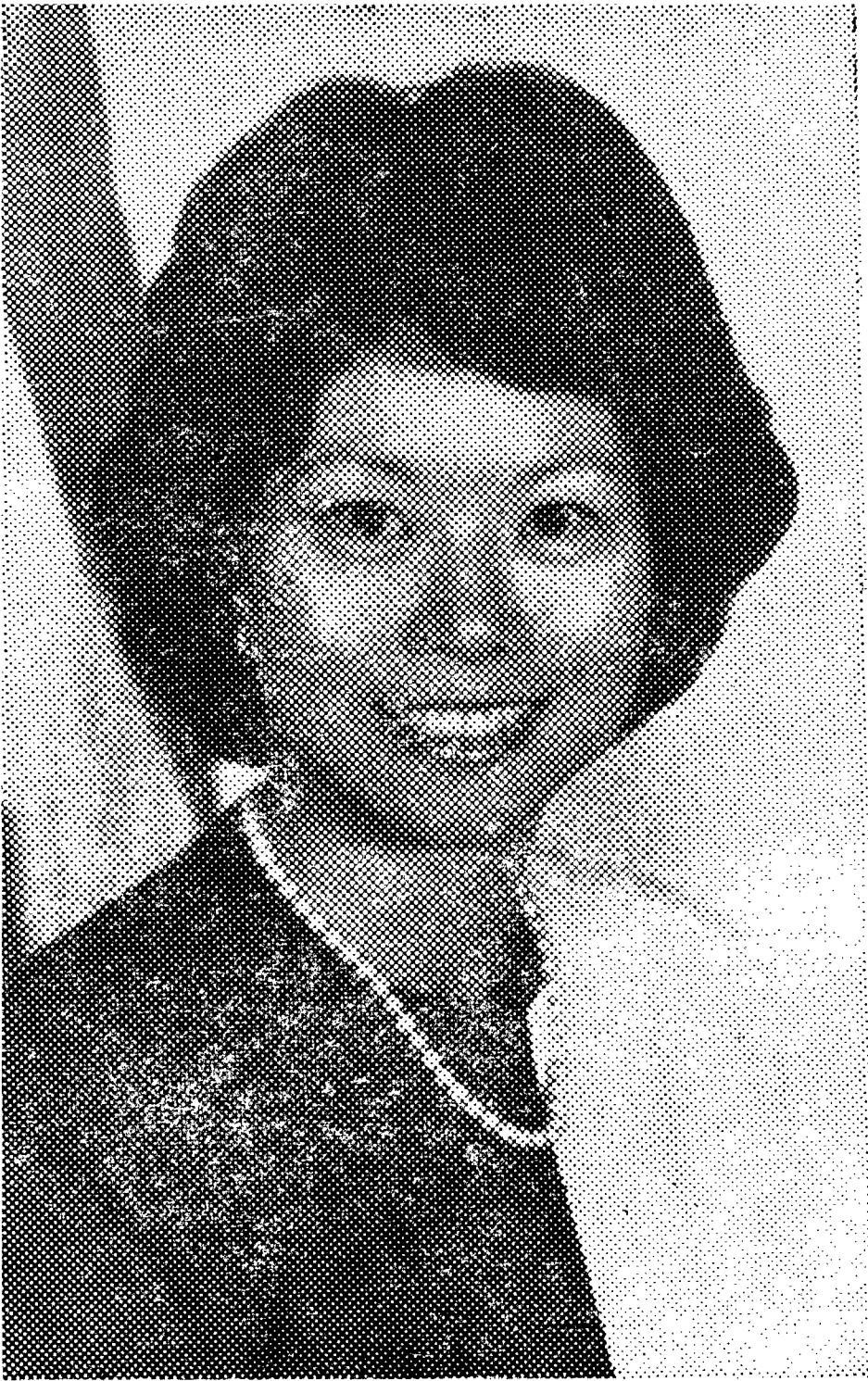
陆俨少作画

张祖麟摄



陆俨少绘林屋暮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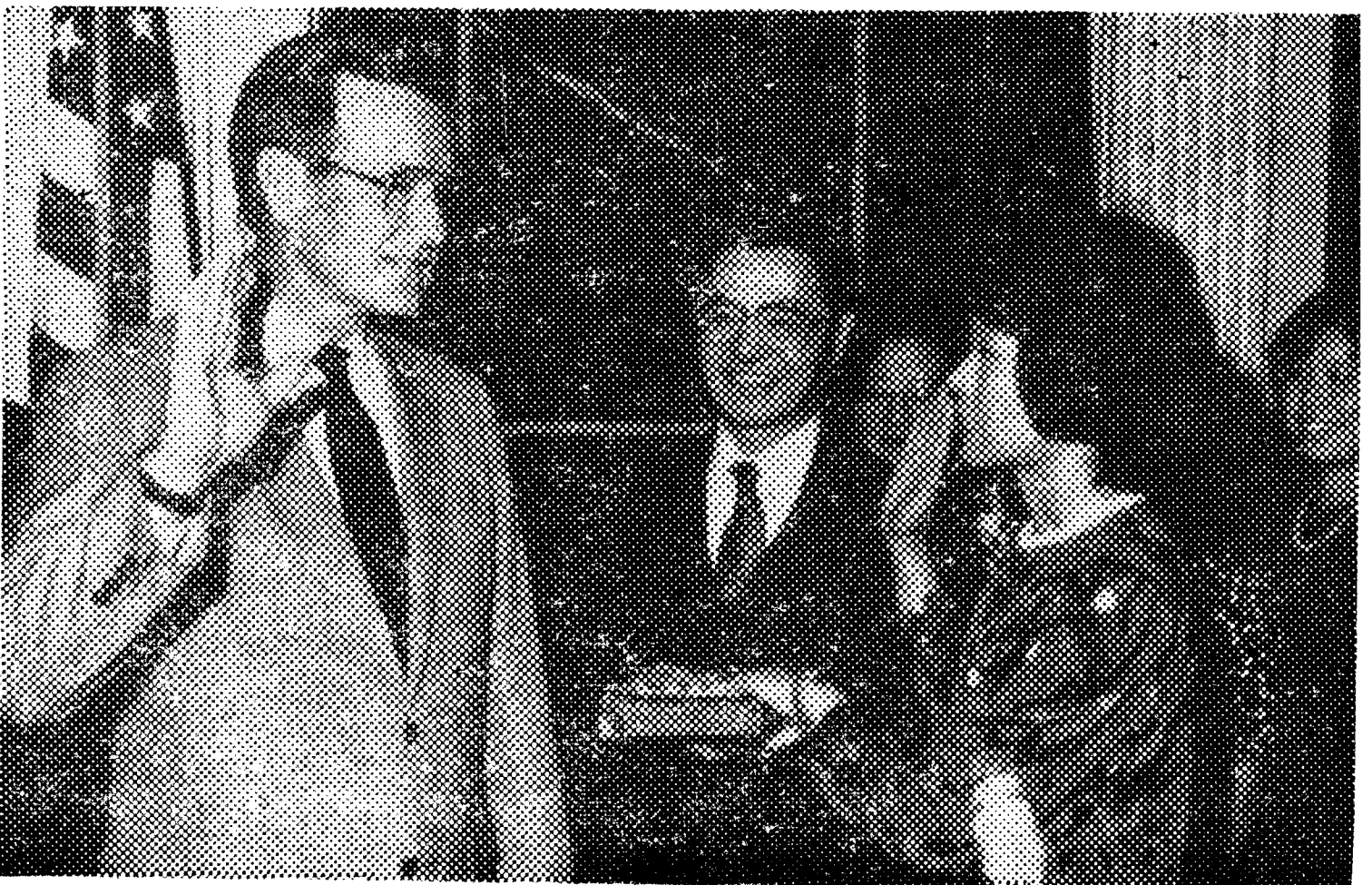
赵小兰小姐倩影



嘉定县侨联供稿

赵小兰宣誓就职

嘉定县侨联供稿



《嘉定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12月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嘉定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目 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嘉定县

- 委员会简史……………钱乃之、周礼德 1
- 中国民主同盟嘉定县委员会简史……………王善骏、沈永淳15
- 中国民主建国会嘉定县支部简史……………廖有猷20
- 中国民主促进会嘉定县委员会简史…朱鹏程、顾德林22
- 嘉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简史……………毛仁渭26
- 黄埔军校上海市同学会嘉定联络组简介……………朱 剑28

嚆城的典当……………王云飞30

嘉定县第一所官立小学堂

- 今嘉定县嚆城小学……………陈德元、李志明34
- 对《嘉定中心小学制的推行》的几点补充……………卢 正37
- 嘉定进步话剧活动的有关史料……………陶继明39
- 嘉定竹刻盛衰琐忆……………顾振乐42
- 南翔的名胜古迹……………钱乃之49
- 昼锦坊……………李宝兴55
- 电影明星参军……………蓝 翔57

先祖父徐文谷传略……………徐植义59

商务印书馆的第二个总理——印育模小传·····	陶继明	61
纪念黄允之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	殷志澄	63
黄虞孙先生传·····	黄守辛	67
杨卫玉生平简介·····	陆象贤	71
戴伯行传略·····	印 克	73
记堂兄水康民·····	水康华	75
钱行素传略·····	陈世和、陈世雄	78
周菊忱一生简述·····	周承湛	80
陈奉璋小传·····	梅 休	83
锡剧著名演员——濮阳·····	<u>赵振威</u>	85
企业家童受民传略·····	殷家纶	92
陈梦渔简介·····	周礼德整理	97

毛齐华简历·····	陆象贤	100
吴雪之·····	陆象贤	104
推拿名医朱春霖·····	姚旭参整理	109
中国画名家陆俨少·····	钱乃之	111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级女性华人 ——赵小兰·····	转载《侨友报》	112

来函照登·····	吴师曾、廖有猷等	115
-----------	----------	-----

封面题字·····	胡厥文	
封面设计·····	张安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简史

钱乃之 周礼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嘉定县委员会(简称县政协)建立于1956年2月25日,由中共嘉定县委、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组成,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本县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活动。1981年7月得到恢复,随着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引下,不断完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制度化、经常化,开创了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历届政协会议概况

(一)第一届委员会 1956年2月25日到2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嘉定县委员会,本届共有委员69人。会议听取并讨论中共嘉定县委副书记刘玉山的政治报告及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潘指行的县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由11人组成的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心议题是“团结全县人民，共同努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会议通过相应决议和《向毛主席致敬电》。

1957年3月29日至31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协主席牟敦高《关于目前形势和县政协1957年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县各界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保证胜利完成1957年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奋斗。

1958年间召开第三次会议，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部分委员错划为“右派分子”，而未能参加会议。

(二)第二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于195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召开，共有委员96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由19人组成的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要求政协更好地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用，为完成1959年各项任务，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会后，举行过多次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联席会议，除传达市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精神外，着重讨论服从党的领导、改造世界观、认清社会主义方向以及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跃进再跃进”等问题。

(三)第三届委员会 1961年9月15日至2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共有委员88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中共嘉定县委的政治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由21人组成的县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号召：各界人士高举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加强团结，努力学习，发挥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作用，以实际行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道路。

1962年8月21日至24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传达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1963年3月25日至27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号召各界人士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精神，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坚持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高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四）第四届委员会 1963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共有委员88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由21人组成的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认为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号召各界人士“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1964年8月27日至30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协主席牟敦高的政治报告和副主席李子仪的《认清形势，做个革命派，勇敢地投入战斗》的总结报告；列席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64年12月26日至27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列席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1965年8月3日至4日召开第四次会议，列席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1965年12月22日至27日召开第五次会议，传达市政协第

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列席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会议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号召各界人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贯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为迎接和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出更大的成绩”。

（五）第五届委员会 1981年7月23日至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共有委员107人。会议听取中共嘉定县委书记李学广的报告，讨论新形势下政协的工作任务；列席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协商领导人选；选举由31人组成的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畅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会议号召全体委员和各界人士，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贡献。

1982年5月9日至12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与会委员对本县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把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斗争进行到底。本次会议增补委员6人，增选常委2人。

1983年3月24日至28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学习新宪法规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的有关文

件；列席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议要求全体委员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新宪法，提高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性；认真学习政协新章程，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

(六)第六届委员会 1984年4月23日至28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共有委员118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由27人组成的县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与会委员对我县提前两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深受鼓舞。会议要求全体委员“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奋发努力，争取新的胜利。

1985年3月26日至29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自本次会议起，不设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提案不受人数、内容和时间限制。建立提案工作委员会，处理各项提案。会议号召全体委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进一步落实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广开言路，锐意改革，为改造嘉定、振兴嘉定而努力奋斗。会议增补委员10人，增选陆建新为县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6年4月7日至11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中共嘉定县委书记王忠明《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发挥更大作用》的讲话；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议要求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充实和改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和方法，充分发挥“综合人才库”的优势，调动委员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为振兴嘉定作出新贡献。

(七)第七届委员会 1987年4月13日至18日召开第一次

会议,共有委员139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报告;列席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由29人组成的县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增设法制工作组和宗教民族工作组,筹建政协之友联谊会。会议号召全体委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建设城郊型、多功能和文明、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嘉定,献计出力,努力奋斗。

嘉定县政协历届委员会组成名额 单位: 人

组成界别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中国共产党	6	10	7	6	5	5	3	6	4	4
中国民主同盟					1	2	1	1	2	2
中国民主建国会					1	3	1	1	2	2
中国民主促进会						2	1	1	2	2
无党派民主人士						2			2	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	1	1	1	1	1	1	1	1	1
工会	5	5	5	4	5	5	5	5	5	5
妇联	2	3	3	3	3	3	3	3	3	3
青联	1	1	1	1						

续表

组成界别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工商界	17	26	23	23	11	10	12	12	10	10
文化艺术界	2	2	2	2	4	3	4	5	10	10
科学技术界	3	3	3	2	10	10	13	14	15	15
社会科学界					1		1	1	2	2
农民	3	5	6	6	8	6	5	5	5	5
教育界	9	15	15	19	20	20	22	23	18	18
体育界					2	2	3	3	2	2
医药卫生界	8	12	10	10	21	21	22	23	18	18
对外友好团体	1									
少数民族		1	1	1	2	2	2	2	3	3
归国华侨、侨眷			1	1	2	2	2	2	12	12
台属					1	1	4	4		
台籍					1	1	1	1		
宗教界	1	1	1	1		1	1	1	2	2

续表

组成界别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合作社	2	1	1	1						
特别邀请人士	8	10	8	7	8	9	11	13	21	29
总名额	69	96	88	88	107	111	118	127	139	147

常务委员会及工作机构

(一)常务委员会 县政协常务委员会由正副主席、秘书长及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候选人由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历届政协首次全会选举产生,名额一般占委员总数的20%左右。常务委员会在全会闭会期间主持各项工作,执行全会决议,审议各委、组活动计划,听取各委、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提交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的重要建议案,决定县政协工作机构的设置及人选等重大事宜。1956~1967年期间常委会每年不定期召开;1981年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建立每月一次主席会议,每季一次常委会议,每年一次全委会议的制度。

政协嘉定县委员会历届领导人名单:

届 别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和职务	备 注
第一届 1956年2月—— ——1959年7月	主席	牟敦高	县委书记	
	副主席	潘指行	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	
		朱德明	县人民委员会秘书	
	秘书长	朱德明 (兼)		
	副秘书长	陈少芸	专职	
第二届 1959年8月—— ——1961年9月	主席	邵晋藩	县委第一书记	
	副主席	宋作栋	副县长	
		汤所均	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	
		樊翔	嘉定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秘书长	宋作栋 (兼)		
	副秘书长	励立	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 任兼主任秘书	
		廖有猷	县工商联副主任秘书	
第三届 1961年9月—— ——1963年11月	主席	牟敦高	县委第一书记	
	副主席	李子仪	专职	
		励立	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 任兼主任秘书	
		樊翔	嘉定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续表

届 别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和职务	备 注
	秘书长	李子仪 (兼)		
	副秘书长	励立(兼)		
		廖有猷	县工商联副主任秘书	
第四届 1963年12月—— ——1981年7月	主席	牟敦高	县委书记	
	副主席	李子仪	副县长	
		许文轩	专职	
		励立	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	
		樊翔	嘉定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秘书长	许文轩 (兼)		
	副秘书长	励立(兼)		
		廖有猷	县工商联副主任秘书	
第五届 1981年7月—— ——1984年4月	主席	李学广	县委书记	1981年10月调离
		王琳	县委书记	1981年10月—— 1984年2月离休
		徐乃霖	县委常委	1983年12月离休
	副主席	黄长兴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1983年12月离休

续表

届 别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和职务	备 注
		廖有猷	民建嘉定支部主任委员	
		陈龙	县中心医院院长	
		浦泳	民盟嘉定支部主任委员	
		王尧章	县科委主任	
		林春明		1983年12离休
	秘书长	黄长兴 (兼)		
	副秘书长	廖有猷 (兼)		
		吕秉君	专职	1982年1月五届三次常委会任命
第六届 1984年4月—— ——1987年4月	主席	惠印林	专职	
	副主席	陈龙	县中心医院名誉院长 县卫生局局长	
		陆建新	中共嘉定县委统战部 部长	1985年3月六届二次会议增选
		廖有猷	县工商联主任、民 建嘉定支部主任委员	
		马克烈	南翔医院副院长 民 盟嘉定县委主任委员	
		毛仁涓	县侨联副主席	

续表

届 别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和职务	备 注
		朱鹏程	民进嘉定县支部 (县委)主任委员	
	秘书长	陆建新	(兼)	1985年3月六届二 次会议增选
	副秘书长	吕秉君	专职	
第七届 1987年4月——	主席	孟宪晋	专职	
	副主席	陆建新	县委统战部部长	
		孙镇	专职	
		毛仁涓	县侨联副主席	
		廖有猷	县工商联主任、民建 嘉定支部主任委员	
		马尔泰	民盟嘉定县委副主任 委员 嘉定镇社会福利院院 长	
		梁天博	县工业局高级工程师	
	秘书长	葛德涵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副秘书长	吕秉君	专职	
		钱乃之	专职	

(二)委员会和工作组 县政协建立初期, 仅在常委会下

划分几个学习小组，定期组织委员学习时事政治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学习中强调思想改造以适应形势。

1981年7月，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建立学习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学技术、工商经济、文史资料5个工作组。1984年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政协章程》第46条第6款规定，按行业、系统建组的精神，设立学习、提案2个委员会和教育、医卫、科技、财经、侨务、文体、城建、工交、文史9个工作组。1985年12月，为了发挥政协人才集聚的优势，又成立咨询服务工作组。1986年3月26日经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将文史资料工作组改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9月6日第六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常委会决定，将咨询服务工作组改为经济技术咨询委员会，形成4委8组。1987年5月7日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决定，组成学习、提案、经济技术咨询、文史资料研究4个委员会及教育、医卫、工业、农业、财经、祖国统一、文体、交建、法制、宗教民族10个工作组。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工作组设正副组长，均由常委会任命。

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组是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经常性组织，在常委会和秘书长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委员在自愿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政协章程，提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和参政议政水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供法律咨询；组织委员就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计划和有关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对话，提出意见和建议，履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权，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参观考察，开展专题调查，作出调查报告，供有关部门作施政参考；受托组织委员进

行可行性论证，发挥政协人才集聚优势，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协助党和政府落实统战政策，宣传一国两制构想，促进祖国统一；征集、研究、编辑、出版文史资料。

提案工作委员会自1984年~1988年共处理有关市政建设、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工商财贸、医药卫生、环境保护、落实政策、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委员提案454件。经济技术咨询委员会曾先后对有关全县若干经济决策和措施，进行专题调查和论证；帮助山东省日照市创办饴糖厂，改进酱油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开展医疗咨询及下乡医疗服务；文史资料工作组(委)自1985年1月至1988年9月，共刊出《嘉定文史资料》11辑。学习委员会为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与民建、工商联于1988年联合举办系列讲座，普及业务知识。教育工作组于1985年和1987年，分别就安亭镇教师液化气供应问题及全县中小学生近视眼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写成调查报告。财经工作组于1986年通过调查，写成《4小件(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糕)供应情况的调查报告》。工业工作组于1986年、1988年对小农具(铁搭、锄头、镰刀、铁锹)生产和亏损企业进行视察、调查，写出了专题报告。法制工作组于1988年对男女同工同酬和计划生育工作进行视察，写出了专题报告，都引起了县人民政府的重视，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财经、工业两组，还受中共嘉定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委托，组织委员和专家对我县“七五”计划草案中乡镇工业部分的几个专题，进行论证，写成《对我县“七五”期间乡镇工业发展中某些部分的几点意见》，得到县委、县府的采纳，减少了损失和浪费。祖国统一工作组为沟通海峡两岸同胞的感情，先后组织归侨、侨眷及港、澳、台胞家属，赴普陀山、沈家门台湾渔民接

待站、奉化蒋母墓、温州乐清县等地参观考察和开展各种联谊活动。其余各委员会和工作组根据各自的不同特点，在发挥政协基本职能，参政议政和推动各项工作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民主同盟嘉定县委员会简史

王善骏 沈永淳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建立于重庆。它是由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6个政治组织联合组成的阶级联盟的政党。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团体会员制为个人参加。其政治基础，最初是抗日救亡，继而是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同舟共济，互勉互励，不断前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亲密友党。

早在解放前嘉定县就建立了民盟直属小组，隶属于民盟上海支部领导。由杨拙夫、浦泳任组长，从事秘密活动。他们都是中华职教社社员。杨拙夫长期工作在上海中华职教社。抗战胜利后，在职教社黄炎培、杨卫玉的支持下，杨拙夫、浦泳分别取得了嘉定县参议会参议长、参议员职务，利用在地方上

特有的关系或明或暗地进行斗争：当得悉国民党县长徐竹漪要逮捕隐蔽在县政府教育科的一名地下党员时，立即通知他转移；驻县中统机关逮捕了参加上海学生运动的一位青年，他们就利用与这个机关头子虚与委蛇的关系，设法营救获释；他们在参议会串联其他议员，抵制了徐竹漪成立“戡乱委员会”的提议；通过了反对征兵征粮的命令的决议，使仓存积谷得以保存，因而使徐竹漪怀恨在心；联系县政府中搞电信通讯工作的人员，随时取得县政府的重要密令。

民盟小组还暗中联系县政府军事科长，策反县保安队，因形势剧变，未获成功。

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大场作战的某师长来嘉定，通知县政府召开各界座谈会时，事前指定要浦泳出席，会上对浦泳假推崇真威胁。1949年5月12日晚上，杨拙夫获悉特务要下毒手，已转移到上海；浦泳因是启良中学校长接到地下党来信，要他坚持护校，与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当晚在校中被捕，遭受枪击，幸在黑暗中未中要害。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成员除浦泳外都离开本县。1957年浦泳被错划为右派，嘉定县民盟组织活动被迫中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浦泳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他在党的新时期统战政策的鼓舞下，精神振奋，从1981年开始，拄着拐杖，为重新恢复嘉定民盟组织而四出奔波。终于联系了50年代参加民盟组织的成员查梓青（外岗农场，现已病故）、徐学彬、徐学娥（县人民银行）3人，先后发展了韦德培、马克烈、茅定波、陈孝宗（现已病故）、周宏德（已退休转沪）5人为盟员。民盟市委在安亭师范发展了王善骏、高如兰2人，共计11人。1982年4月21日建立了民盟嘉定县支部委员会。浦泳

任主任委员，韦德培任副主任委员，马克烈任组织委员，王善骏任宣传委员。

民盟嘉定县支部成员，大都是文教、科技、医卫界的业务骨干，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盟支部成立后，特别注意对盟员的自身教育，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和邓颖超主席在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教育盟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民盟的光荣传统，和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守职尽责，踏实工作；加强和党员、群众的团结，以诚相见，广交朋友，肝胆相照，当好诤友，在群众中树立声誉。因此，本县许多学有专长、热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积极要求参加民盟组织。盟支部以坚持素质为前提，贯彻“在工作中发展，发展为了工作”的原则，陆续发展盟员，到1984年10月，新发展盟员50人，转出2人，病故3人，共有盟员56人。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同志代表民盟中央，曾到我支部视察，并作了指示，使支部成员深受鼓舞。盟支部还推派马克烈出席了民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盟中央组宣工作会议。

1984年10月19日，经民盟上海市委批准，在中共嘉定县委的支持下，成立了民盟嘉定县委员会，是本市郊县中较早成立的盟县委。浦泳任盟县委会主任委员，韦德培为副主任委员，马克烈任副主任委员兼管组织，盟县委委员有陈贵镛、马尔奉、王善骏、茅定波，下设嘉定第一、嘉定第二、设计公司和南翔4个支部和安亭，真如、长征、江桥2个直属小组。盟务由部分委员和盟员积极分子徐学娥、王帼玲等轮流值班。

1985年3月31日，主委浦泳病逝。4月，分配沈永淳担任民盟县委专职干部，并分配了办公用房。5月，经民盟市委批准，由马克烈接任民盟嘉定县委主任委员。9月，副主委韦德培等

在真如地区工作的9位盟员，随地区划归普陀区而转出。翌年3月马克烈调任民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民盟第一届嘉定县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缺额，亟需充实调整。8月，由民盟县委委员会议选举，并经民盟市委批准，由陈贵镛任主任委员，马尔奉任副主任委员兼管组织，王善骏任副主任委员兼管宣传，委员：茅定波（宣传）、沈永淳（常务）、韩云山（联络）、王帼玲（妇女）。

1987年10，民盟嘉定县第一届委员会任期届满。3年中，发展27人入盟，转入3人，转出11人，病逝3人，实有盟员73人。通过换届，选出第二届委员会，经盟市委批准，陈贵镛任县委会主任委员，马尔奉任副主任委员兼管组织，王善骏任副主任委员兼管宣传，委员：沈永淳（宣传）、王帼玲（妇女）、韩云山（联络）、茅定波（老年）。平均年龄为54.42岁，比上届下降7.43岁。

盟县委会调整了下属基层支部及支部成员。现有嘉定第一、嘉定第二、嘉定科技、南翔、安亭5个支部，南翔支部下设3个小组，民盟县委成立后，还办起了《嘉定盟讯》刊物，除对盟员进行思想教育外，也是盟员发表自己言论的主要园地。与此同时，在面向社会，搞支边，开展科技、医务咨询，为四化建设服务；做好“三胞”和对外联络以及关心盟员等工作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提高了民盟的声望。

1987年4月29日，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天专程来嘉定参加盟市委在嘉定县召开的区、县正副主委和专职干部会议，对嘉定县的盟务工作进行了视察并讲了话，使与会者对继续搞好盟务工作，开创新局面，有了新的认识和启发。

嘉定民盟组织，按照党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方针，鼓励盟员积极参政议政，进一步发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

极作用。在历届县人大、县府、县政协任领导职务的盟员中，有韦德培、陈孝宗曾任县人大副主任，马克烈曾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浦泳、马克烈曾任县政协副主席，马尔奉为现任县政协副主席，另有陈贵镛等19名盟员曾任历届和本届的县人大常委，县、乡、镇人民代表，县政协常委、委员等职。

嘉定盟员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立足本职，积极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中被评为市劳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全国科协部、市、县、局、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或记功的，市、县“三八”红旗手，市、县盟务积极分子等称号者，共有166人次。有7位盟员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盟员中在海外有亲友者甚多，盟县委经常鼓励他们与之建立通讯联络，宣传党的政策。在解决出国探亲、定居等问题上，盟县委一贯尽力向有关方面如实反映，帮助联系。如1986年初，帮助老盟员刘静波老师，相约阔别30多年、现定居加拿大的二弟于是年春节，在香港三弟家三兄弟会面；1986年，为解决陈贵镛主委的幼女去香港定居，向统战部及时作了反映，经过共同努力，于1987年9月成行。退休盟员李际瑞曾二次赴美探亲，行前盟组织为她开欢送会。在美亲人们规劝她在美国定居，她却向亲人们宣传党的政策，介绍祖国四化建设成就，提前回国。1984年、1985年，马克烈、陈贵镛相继出访日本。陈贵镛也经常利用在接待欧美等各国代表团来嘉定参观访问的机会，向外国友人宣传党的政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

嘉定民盟在中共十三大精神指引下，正在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继续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推动盟员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发挥智力优势，为坚持改革、开

放、搞活经济，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巩固、发展安定团结，为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

中国民主建国会嘉定县支部简史

廖有猷

1950年5月，苏南区物资交流大会在无锡举行期间，由于嘉定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出色，赢得各方面的重视和赞扬，嘉定县代表团负责人潘指行、高启华、印克，经民主建国会苏南区委员会主任钱荪卿介绍，加入民主建国会，组成民主建国会嘉定小组。苏南、苏北合并成江苏省后，受民主建国会江苏省委员会领导。

1956年3月，又有嘉定县工商联的廖有猷、汤所均、韩炳初、励立、吴元雄等5人参加，遂于当年6月成立民主建国会嘉定支部筹备委员会，由潘指行任主任，直属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领导。1958年8月，潘指行逝世后，由励立任主任。此后逐渐发展会员，至1966年初，有会员17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止活动。1981年3月，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批准，正式建立嘉定县支部，恢复活动。10多年的人事变迁，有的死亡，有的迁移，当时仅有会员12人，经过民主选举，由廖有猷、韩炳初、印克3人为支部委员，廖有猷、韩炳初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在从事经济工作的中、上层人士中发展会员，至1988年

1月支部改选时，有会员24人，由廖有猷、俞善美、朱建新、吴宗保为支部委员，廖有猷任主任，俞善美任副主任。

嘉定的民主建国会组织建立以后，会员们积极参政议政，有的担任了县的领导工作，如潘指行、汤所均、韩炳初相继担任副县长。历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驻会委员会、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政协常务委员会中，都有会员担任委员，潘指行、汤所均、励立、廖有猷还相继担任县政协副主席。

由于民主建国会的任务和工商联有某些共同点，成员也有一部分交叉，因而在工作中与工商联有着亲密协作的关系。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指引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创了新局面，增添了新内容。民主建国会嘉定县支部通过组织学习和协助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了会员投入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会同县工商联发挥优势，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专业培训，做好联络工作，正在为振兴嘉定积极开展活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嘉定县委员会简史

朱鹏程 顾德林

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1980年8月,民进上海市委鉴于嘉定有教师直接去市委组织部申请入会,同时有6名民进会员从上海市区退休回嘉定,为了适应需要,派联络员朱人冠来嘉定商讨成立民进嘉定直属支部事宜。在中共嘉定县委统战部的支持和民进上海市委的具体指导下,积极筹备,于1980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民进嘉定县直属支部。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张乃璇、方学武出席了成立会,并委派陆九华、张祖文为支部正、副主任。支部成员有陈汉倩、廖世瑜、朱召基、顾德芳、徐尚善5人。其中最高年龄84岁。平均年龄69.1岁。不久,徐尚善工作调动,关系转出。

民进嘉定直属支部建立初期,因群众对民进了解甚少,因此活动单一、发展缓慢。到1982年底陆续发展了樊翔、蔡惇、徐植璧等15名会员,会员增至21名。其中在职教师12名、退休教师9名。1982年上半年增添唐文远为支部委员,1983年上半

年再增桑恬为支部委员。

1982年4月，为便于开展组织活动，成立民进娄塘小组，由滕雪永任小组长。

1984年2月29日进行改选，经民进市委批准由朱鹏程、张祖文、王元昌、解逸、严德明5人组成第二届支部委员会。朱鹏程为主任委员，张祖文、王元昌为副主任委员，并聘请桑恬为妇女干事。原支部主委陆九华因年老多病，屡次请求退出支部领导的愿望得以实现。至此，共有会员26名，其中在职教师17名、退休教师9名。

第二届支部委员会成立后，认真组织会员学习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加强组织的自身建设，自尊、自重、自强，提高了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方针政策水平；激励全体会员为更好地教育、培养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作出贡献；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协助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会员中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以逐步、逐件妥善解决，既调动了本人及其家属的积极性，又增强了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力。

第二届直属支部的26位会员中，1人被选为县人大代表，3人被聘为县政协委员（其中1人当选县政协副主席），2人被选为乡、镇人大代表，给参政议政提供了有利条件，发挥了民主党派应起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健全组织，支部建立了会议、学习制度，进一步搞好组织的整顿、巩固和发展工作。在发展中，充分注意到发展对象的素质，严格掌握中上层、代表性，并在广泛听取有

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严格履行入会手续。与此同时，以民进章程为中心内容，教育新老会员，正确认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作用，要求盟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奋工作，作出贡献。

在认真开展与中小学教育有关的咨询工作、开发智力、推进嘉定地区的教育改革上，支部先后组织会员及会外教师收听、收看特级教师袁璐、于漪、霍懋征等的示范教学录象课；请特级教师丁成宝、乔永清和著名教师贾志敏等来嘉定上课，作教学辅导报告；开展“家庭教育”、“独生子女教育”咨询；开办幼儿英语口语班、幼儿书画班；与民盟南翔支部联合举办初级技工培训班等。

1984年12月底，共有会员32人，至1985年底发展到45人。为了适应较大发展的形势需要，以利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围绕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嘉定县四化建设的目标开展工作，1986年7月8日经批准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朱鹏程、王元昌、严明德、邵泽南、汪杏茹当选为第一届县委委员。经民进市委批准，朱鹏程为主委，王元昌为副主委。决定建立南翔、安亭、娄塘、进修学校、教研室、镇一中、小教7个支部。其中会员在8人以上的南翔、进修学校、教研室、小教成立支部委员会。何银娣、林春霖、严明德、徐永森、邵泽南、汪杏茹经民进市委批准分别担（兼）任各支部主任委员。

1986年底建立民进嘉定县委办公室，1987年3月调顾德林担任专职干部。

遵循党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民进嘉定县委又吸收了中国科学院光学研究

所2名高级工程师、3名工程师为会员。1987年7月17日分别举行了光机所支部成立大会及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咨询服务部嘉定分部成立大会，委派张洪林任支部书记委员兼咨询分部主任，恽稚辉、黄醒环任副主任，咨询分部由县委副书记委员王元昌分管。咨询分部成立后，先后为嘉定及安徽、南京、奉贤、常熟、宝山等有关单位提供光学、激光、真空镀膜、电子技术等服务，获得良好效果。1987年12月27日又在安亭成立咨询小组，由杨祖钰任组长，为汽车制造及维修提供科学技术咨询。

民进嘉定县委重视发挥自身优势。在会员中广泛开展教学研究和学术研讨，鼓励学有专长的会员撰写论文，著书立说。朱鹏程、徐永森等除每年为本县作多次学术报告外，还去山西、广西、山东、河南、江苏等地作学术报告，交流教学经验。陈一凡、唐养申、朱鹏程、徐永森、冯思麒、杨水源、包雍然等共发表了150万字以上的著作、论文和经验介绍，获得过各种奖励。徐望达、王元昌等还利用业余时间各界绘国画近百幅。历年来会员中有4人次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班主任、全国优秀儿童少年工作者称号，有9人次获市（省）级先进称号，有35人次获地、县级先进称号，获其他各级各类先进称号的有53人次。

目前民进嘉定县委有会员65名，分设8个支部。有一人当选县九届人大代表（兼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人当选为乡镇人大代表。在县政协七届委员会中，有4人被聘为委员，其中1人当选为常委。

嘉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简史

毛仁涓

嘉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是在嘉定县归国华侨联络组基础上建立的。1984年5月12日召开嘉定县第一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成立嘉定县归国华侨联络组。经大会选举，由林学任组长，毛仁涓、李璆玑任副组长，叶钦松、苏日燕、宗荣全为组员。联络组是在中共嘉定县委领导下，接受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团结本县归国华侨和侨眷的人民团体。其任务是鼓励和协助本县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协助有关部门宣传、落实侨务政策；引进人才、争取外汇，促进经济发展；组织侨属生产，举办福利事业，为归侨、侨眷服务，争取侨心，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奋斗。

1984年7月，联络组为解决部分归侨、侨眷和港、澳、台胞家属的就业问题，并筹集活动经费，以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在县人民政府支持下，由本县的归侨、侨眷和港、澳、台胞家属自愿集资，先后与戩浜人民公社城东大队联办生产数字系统工程实验仪、PH测定器、新生儿黄疸灯治疗仪、JDB—I型白度计的上海市华侨仪表厂；与复建纸箱厂、嘉西乡虬桥村联办生产中小型纸盒，兼营内销纸箱的上海市嘉定侨联纸箱厂，安排归侨、侨眷及其子女55名。同年9

月6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批准，成立上海市华建公司嘉定县分公司，发挥本县侨务渠道的优势，筹集侨资，发展侨属企业，又创办了嘉定侨联民间工艺厂。

1985年6月，在筹建嘉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工作，先后建立起21个乡、镇和3个局的联络组，在12个局中设联络员，全县共有联络员90名，从而对全县12名归侨、335名侨眷、1727名港澳同胞家属、564名外籍华人家属、1145名有其它海外关系者加强了联系。

1985年8月28日至29日，举行嘉定县第二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10人。市侨联、市侨办、中共嘉定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以及乡、镇、局、部、委、办领导和郊区9个县侨联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通过了联络组长林学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嘉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条例；协商选举林学、毛仁涓等15人组成侨联委员会。推举林学、毛仁涓、李璆玑、周丽玲、宗荣全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林学任主席，毛仁涓、李璆玑任副主席，任命陈继瑞任副秘书长。此后，每逢元旦、春节、国庆、中秋、圣诞等节日，分别组织访问，或举行茶话会、联欢会、游园会等联谊活动。平时，通过来信来访，商请有关部门帮助归侨和侨眷解决住房、落实政策、就业、入学和排解纠纷；积极开展海外联谊活动，如顾维钧逝世时，曾向其家属发唁电致哀，并参与接受其家属捐赠顾维钧遗物；参与接待赵锡成夫妇，筹组“木兰教育基金会”；参与接待香港中央浆纱厂董事长兼厂长宗福全，洽谈捐款兴学；以及接待美洲华侨日报总经理兼副社长毛仁浩等。侨属企业经过整顿，现有上海华侨仪表厂、嘉定侨联民间工艺厂和嘉定华嘉五金电器厂，生产走上了正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既解决了部分侨属的就

业问题，又为侨联开展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经费。

1988年11月23日至24日，举行嘉定县第三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14人，选举林学、毛仁涓等19人组成侨联委员会，推举林学、毛仁涓、周丽玲、万瑞源、宗荣全、刘峰、王文康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由林学任主席，毛仁涓、周丽玲任副主席，万瑞源任秘书长。

黄埔军校上海市同学会 嘉定联络组简介

朱剑

黄埔军校创建于1924年，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1984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徐向前（一期）。不久，有些省市相继成立了各个地区的同学会。在美国也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情感，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早在1941年10月，延安也成立过黄埔军校同学会延安分会。

黄埔军校上海市同学会成立于1985年3月。当时的名称是“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包括浙江、福建两个省，会长宋瑞珂（三期）。1988年9月，两省一市各自成立同学会，名称一律把“黄埔军校”校名放在省、市地名之前。黄埔军校上海市同

学会下面又先后成立了12个区、县联络组。

嘉定县联络组，是在1987年春夏间，在中共嘉定县委统战部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上海市会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1987年10月正式成立。成立之日，中共嘉定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及县委统战部等领导同志和民盟、民建、民进、侨联、工商联的代表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上海市同学会会长宋瑞珂、副秘书长夏世铎及宝山县联络组组长彭望湜等也专程前来指导和祝贺。

大会选举范锡品为联络组组长，朱剑为副组长。范锡品在会上作了筹备经过的报告。朱剑作了今后工作打算的报告。会长宋瑞珂、县政协副主席兼县委统战部部长陆建新、县政协副主席廖有猷、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陆象娟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全组同学举行座谈，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增进新知识，发挥余热，为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决定今后每月此日（16日）为联络组的定期学习活动日。

组长范锡品，现年74岁，星子特训班4期同学。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员，国大代表，现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嘉定县政协委员。副组长朱剑，现年75岁，本校12期同学，曾任国民党部队旅上校参谋长、军上校参谋处长，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衢州、鄂西、长沙等战役，现任县政协委员。范锡品因上海市文史馆工作较忙，1988年6月，辞去组长职务，另选翁大钺继任组长。翁大钺，现年70岁，七分校17期同学，曾任国民党部队炮兵营上尉指导员。

嘉定联络组成立时，共有会员范锡品、朱剑、翁大钺、张锡康（洛阳分校军官班2期）、潘伯萍（苏干班军官二队）、唐灏（本校15期）金梦麟（三分校16期）、莫如棠（三分校16期）吴世纯

(16期)、杨希侣(本校16期)、陆中方(三分校军官班8期)、徐树望(七分校16期)、项勇(本校17期)、王楚章(七分校17期)、钟志仁(工兵18期)、戴思聪(七分校19期)、沈斌(七分校19期,户口在南市区,现在嘉定工作)等17人。后又有朱英(女,七分校17期)、黎潭生(七分校17期),秦南奎(本校16期)等3人先后入会。以上除吴世纯已迁湖北外,嘉定组现有19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张锡康,82岁,曾参加过1927年的北伐战争,1932年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张治中)88师当中尉排长时,又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在大场战斗中,子弹穿胸负伤。

嘉定组同学的兵种:步兵14名,炮兵2名,骑兵1名,工兵1名,辎重兵1名。

嚆城的典当

王云飞

典当,是旧社会的一种金融行业,一般由地主、富商、官僚等合资或个人独资经营,按资本的多少而分等级。民初时,江苏省规定:架本(即当出本金)在8万银两以上者称“当”,架本在4万银两以上,不到8万银两者称“质”。此外,乡镇中还有一种“代当”,俗称“代步”,是典当的派出机构,具有代理商性质。押店不能称“当”,招牌上也不得用“当”字。

向典当质押借贷的，以城乡贫苦者为多。他们遇到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时，生活难以维持，在告贷无门的紧急关头，不得不把家中的衣物、用具，向典当押借。他们明知典当要收高利以及押品存箱费或易碎品手续费等，也只得饮鸩止渴，以济燃眉之急。

向典当质押告贷的，还有富有人家的败家子，乃至盗贼，其典押品有金银珠宝等较珍贵物品。

押借规定期限，一般为18个月，到期不赎，押品归典当所有，叫做“没当”。

典当质押借贷利率，一般为月息2分（清代状元秦大成家所开的典当，仅收月息1分，被称为“秦氏一分当”，即押借10元，18个月到期取赎，除归还10元本金外，另付利息3.6元。

嘉定镇有以下几家典当：

一、济平典当。

1871年（同治十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邀同常熟人翁同和、浙江王文韶等清廷显贵，集资6.5万千文，在本县南大街肖山堂秦家园开设济平典当，有职员13~14人，学徒10多人，加上厨师、更夫、杂役，共30余人。清末民初，全年营业额在30万元以上。

为扩大营业，总店开业不久，就在西门外大街（现在西门百货商店对面）开设分典。此后，又在娄塘镇中大街开设代步，称“协成当”，有职员、学徒、杂役等10余人。分典、代步收到贵重押品，如金饰珠宝，都送总典保管。

1915年（民国4年），盛宣怀病故，济平典当由其子女继续经营。此后，娄塘代步曾遭抢劫。1924年（民国13年）齐卢战争，战火波及本县，济平总典、分典均遭散兵游勇抢掠，西门分

典因房屋被焚而停业。

1932年(民国21年)，“一·二八”战争发生，本县一度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平总典在又遭抢劫之后。又因兵荒马乱而停业。战后，暂留部分职工办理放赎幸存押品的善后事宜，约一年，给资遣散职工，就此停业。

二、德大典当。

济平典当停业后，邑人顾吉生、金伯琴等筹集资金10万元，于1933年(民国22年)5月，在济平当原址，开设德大典当。金伯琴任经理，聘请熟谙典当业务的徐善庆、吴庆云2人负责业务管理，雇用济平当老职员汪震声等，连同学徒、杂役，共20多人。每年营业额近20万元。

总店开业不久，在娄塘设代步，沿用“协成”原名。有职员、杂役等12~13人。

1935年(民国24年)1月，娄塘代步在陆渡桥设二级代步，由娄塘代步的2名职员轮流前往主持业务。

德大典当以高于银行的利率向外界吸收大量存款，以补资金不足。当时，银行存款利率为4厘，典当则为6厘，而向押贷者所收利息则为2分，因此仍可从中获利1.4分。

1937年(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德大典当遭日机轰炸，部分押品被毁。因德大典当曾向上海天一保险公司投保火险，被炸后，取得该公司赔偿3万元。当户取赎时，按被毁押品折价赔偿。此后，在本县沦入敌手之前，总典和代步及时用船把押品、帐册等运往青浦县朱家角，租用民房，暂时存放。同时，留少数人员在嘉定，办理押品回赎手续；押品由每日来往于嘉定、朱家角之间的船只运送。

后来，朱家角也岌岌可危，该典当在撤近上海后，因难以

营业，即行停业。

三、嘉丰典当。

1941年(民国30年)，汪伪统治时期，嘉定纪王乡人钱孝慈，邀集股东30余人，筹集资金6万元（当时白米每石100元），租用南大街学桥堍胡姓房屋，开办嘉丰典当。钱孝慈自任经理，吴庆云任帐房。

开办初期，尚能维持。后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每石米价达10万元），虽然将贷款利率提高到6分，仍面临亏损，至1945年(民国34年)初，宣告倒闭。

是年3月，南翔镇人陈尧勋恢复嘉丰典当，经营2个月，也因社会动荡，物价猛增，资金不足，宣告停业。同年6月，陈尧勋的女婿金象贤接办嘉丰典当，向银行借贷，以维持营业，但仍难以维持。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不灵，再次停业。

1946年(民国35年)底，商人王炳章，依靠金伯琴等的支持，恢复嘉定典当业务，职工仅4~5人。押放利率提高到月息3角。王炳章手腕玲珑，典当生意也趋于活跃。翌年，该典当转让给陈尧勋之子陈加田经营，押借利率提高到月息3.6角。还用典当名义吸收私人存款，并把存款转到无锡放高利贷。1948年(民国37年)底，因社会动荡不安，物价飞张，宣告停业。

嘉定县第一所官立小学堂

——今嘉定县嚆城小学

陈德元 李志明

今嘉定县嚆城小学，历史悠久，校名屡改，是本县一所颇有声名的学校。

清末，“新学”渐兴，但本县起初兴办的一些小学堂均系私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8月，邑人廖寿丰捐银3,500两，在西门内大街赵公桥畔创办私立清华书馆。此为今嚆城小学的最早前身，同年核准立案。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知县捐廉资助，把清华书馆迁到当湖书院内。改为官立。更名为嘉定小学堂，成为本县第一所官立小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遵章改称嘉定高等小学堂，修业期为4年。

1912年（民国元年），改名为嘉定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修业期限改为3年。1923年（民国12年），与设立在明伦堂的嘉定县第二初等小学合并，成为完全小学，更名为嘉定县第一小学。1928年（民国17年），本县推行中心小学区制，该校改名为嘉定县奎山中心小学校。1932年（民国21年）、1937年（民国26年），日军两次侵占本县，该校都被迫停课。第一次，该校校具、图书被毁殆尽；第二次，校舍被毁，学校设备散失无存，停课长达8年。1945年（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该校修复校舍后复

课,定名城中心国民学校。1946年(民国35年)8月更名为礪城镇中心国民学校。

自清末以至民国,该校尽管历经变化,屡改校名,但由于治校有方,所聘教师颇具才学,并以品学兼优要求学生,卓有成效,因此学校声望渐隆。本县教育界知名人士戴西绳、王为震、严善宝等,都曾在该校担任过校长。曾在该校任教的教师如朱顺昌、潘仰尧、王孟达、杜凌霄等在教学上颇多建树,有的后来成为教育界著名人士。该校学生毕业后,不少考入中学、师范,乃至进大学深造,后来在政界、教育界、工商界施展才能的颇不乏人。

1949年5月嘉定解放。1951年,封文耀继李雄才之后,任该校校长。1953年8月,县文教科定礪城中心小学为县重点小学,把学校迁到原企云小学旧址(今嘉定镇汇龙中学所在地),调朱鹏程任该校校长,许纫慧、毛功倍等为该校教师。当时的学校规模:小学,6班;幼儿,1班;学生300多人,教师12人。在全县小学校中率先成立校内学科教研组,从事教学研究,组织校内乃至全县性的公开教学,以求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校内外,各开垦一块土地作为师生劳动的农田,栽培作物,记录生长情况,作农业科学试验。1956年,许纫慧、徐忠明被评为县优秀教师,毛功倍被评为省优秀教师,朱鹏程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59年9月程继元继朱鹏程之后担任校长时,该校作为中心校,管辖南郊、启良、普通、云翔4所完全小学。1960年改为今名——嘉定县礪城小学,受当时的嘉定县城厢镇中心小学的管辖。

1966年开始,10年“文革”期间,该校的教学受到严重干扰。1971年,由于学校布局调整,该校与当时的劳动中学(即

今汇龙中学,当时校址在东下塘街99弄)互换校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嚮城小学重又走上正轨。1984年,孙兰芬任校长,进一步致力于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全校师生学习雷锋,蔚然成风。1984年和1985年谭均强、张琴宝两位教师先后各拾到手表一块,1986年学生黄艳拾到现金60元,1987年学生潘奕拾到存折230元,都及时上交公安派出所。1986年该校毕业生参加会考,语文、数学、英语3门功课平均分数为83.6分,名列全县完全小学第三。体育方面,嚮城小学是县内培养乒乓苗子的一个基地,在乒乓赛中屡获好名次:1984年获上海市郊县女子组亚军;1986年获上海市郊县第六届小学生运动会女子乒乓单打第一名和女子团体第三名。

1986年5月22日,荷兰外宾来嘉定访问,整整一天在嚮城小学参观、听课、录像;回国后制成一部电视片,其中反映了嚮城小学的教育、教学以及学生活动情况。

1986年9月,该校被评为县先进小学;1987年被嘉定镇命名为文明单位,该校小学生红十字会被评为市郊县先进单位。

本县第一所官立小学堂,今嚮城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在焕发出新的光彩。

对《嘉定中心小学制的推行》 的几点补充

卢 正

嘉定县实行中心小学区制之初，我曾亲历其境，因而对《嘉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所载李志明同志的《嘉定中心小学制的推行》一文，感觉有些叙述与史实不符，兹将我忆及的情况，略述如下，请读者辨别。

嘉定县中心小学区制，渊源于1927年“四·一二”后南京中央大学区制，因而李文的主题《嘉定中心小学制的推行》，应为《嘉定县中心小学区制的推行》为妥。

毋庸讳言，嘉定的地方势力，原有戴(伯寅)、黄(允之)两派，在教育界中互相争斗最为激烈。在每届教育会选举时，往往大打出手。著名的打手，戴派有周友宾等，黄派有陆友白、戴企留等。1926年嘉定县教育会改选，黄派获胜，戴派教育局长戴西绳去职，黄派娄塘乡董潘指行于是年6月就任教育局长。因而李文所述：“1927年北伐军抵达嘉定，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之后，潘昌豫(字指行)出任嘉定县教育局局长。”不是“出任”，而应是“继续担任”。

潘指行任教育局长后，县督学由黄派的杨希时取代了黄派的王孟远。不仅教育局换班，连县立第一、第二、第四高等小学的戴派校长也尽被撤换。但对于农村初级小学校长，尚

苦于鞭长莫及。其时，恰巧南京政府实施了中山大学区制，胜利地接管了东南大学。嘉定县教育局便仿而效之，于1928年秋实行嘉定县中心小学区制。

从此，中心小学校长又是全区各初级小学的校长。各初级小学设主事一人，必须秉承校长旨意，主持校内工作，但无用人之权。如此则连单级初小，也都被控制了起来，造成了全县小学教师大换班，以致不少教师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又使全县教师缺额竟逾百数，不得不向邻县求援。李文所述：“根据需要，延聘在外地工作的卫光炯、陈其械、叶心符、毛广勇等几位嘉定知名教师接替各中心小学校长。又按照部颁标准，从昆山、崇明等县以重金聘请了100余名教师到嘉定县各中心校任教，使嘉定学校的校长、教师队伍面目一新。”其实卫光炯等都是应聘为首任各中心小学校长，所以是“担任”，而不是“接替”。李文中对被解聘的100多名戴派的小学教师和校长，竟只字不提。事实上被解聘的人员中，固然有少数是不合格的，但对办学有成就的也不乏其人，如练子葵、黄毓琦、奚汝梅、何方良、杨叔明等被解聘后，有的被市教育局任用；有的在市中学任教；有的在市办起了中学或小学，以此亦可作为佐证。

嘉定县中心小学区建制以后，教育局和国民党县党部的矛盾，由暗斗转为明争。教育局运用中心小学区制，由各中心小学校长把全县教师召进城来，举行拥潘（指行）反童（传俊）大会，直闹到省。最后，由省政府出来做和事佬。委曲潘、童同时离职了事。

此外，教育局还利用中心小学区制，反对省教育厅委严子嘉复任嘉定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原以为通过各中心校长发动小学主事、教员签名盖章，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当某中心校

长叫武村初级小学主事武宝琛签章时，武不但不签名，反而声明：“严先生是我的老师，是个好老师，同学们有口皆碑。这样的好老师作县中校长怎能反对！”但严的复任终成泡影，那时原县师同学顾兆文、武宝琛、季如松、张乃璋、卢章炯等才毕业两年，血气方刚，对中心小学区制的非教育活动深为不满，曾经编印了《课余》、《知困》等刊物予以揭露，其中尤以武宝琛写的《指行与知行》，把中心小学区制与晓庄师范作了对照。可惜这些刊物已经在战后遗失。李文对这一些事件也未提及，特加补充，以便读者作比较全面的评价。

嘉定进步话剧活动的有关史料

陶继明

嘉定进步的话剧活动，主要在三、四十年代。

(一)

1931年10月，在上海大同大学求学的嘉定进步学生葛激霁(葛一虹)，在上海电报局工作的嘉定进步青年瞿金驹(瞿白音)，以及嘉定进步青年田鲁、查临恺、陈寰积、朱鋈等发起，组成了进步的青年团体——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

这个组织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创办进步刊物——《嘉定青年》；二是成立了进步剧团——暴风雨剧社。这个剧社的演员，以进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

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嘉定曾一度沦陷。1933年4

月，该会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在奎山民众教育馆（即嘉定民教馆）的协助下，由葛一虹、瞿白音出面，通过剧作家章泯，邀请“上海骆驼演剧队”来嘉定与“暴风雨剧社”合作演出。

为了扩大影响，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在嘉定四城门张贴海报，预告演出消息。

4月4日傍晚，上海骆驼演剧队抵达嘉定。4月5日、6日，该队与嘉定暴风雨剧社正式在奎山民教馆公共讲演厅（即嘉定孔庙明伦堂）日夜演出。上海骆驼演剧队演出7个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高尔夫速写》、《六·二三》、《谁是朋友》、《梅雨》、《帝国主义狂舞》等。嘉定暴风雨剧社演出两个话剧，《转变》和《嘉定三三》。

上海骆驼演剧队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高尔夫速写》是影响很大的街头剧，讽刺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再现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悲惨流沛的生活，在观众中引起“反响最为强烈，因为剧情适合于一度沦亡的嘉定的民众和表情的深刻，果然赢得了观众的眼泪。”（田鲁《嘉定公演记》·《嘉定新声》民国22年5月1日刊）此外，《到前线去》、《六二三》、《谁是朋友》、《梅雨》、《帝国主义狂舞》等，都是控诉日寇暴行，鞭挞汉奸丑态，歌颂伤员重上前线，士兵英勇杀敌，人民团结抗敌的。

嘉定暴风雨剧社演出的《转变》及《嘉定三三》，以1932年3月3日，日寇侵占嘉定为历史背景，揭露了嘉定沦陷期间，日寇烧杀抢掠的暴行，鞭达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这两个话剧由于“最适合于当地观众，加之化装与表情的逼真，已将观众的情绪驱激到最高潮，掌声、怒吼、效果和成功都在他剧之上。”（田鲁《嘉定公演记》·《嘉定新声》民国22年5月1日刊）

这次话剧公演的编导和主要演员为陈鲤庭、左明、苏薇、高原、葛一虹、瞿白音、田鲁等。所售的票资，除演出开支外，都捐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据1933年5月1日《嘉定新声》报导，因这次公演与1932年嘉定沦陷仅隔一年，嘉定人民对日寇的暴行记忆犹新。故演出时，“一般观众，颇形紧张，于是掌声雷动，狂叫打倒帝国主义及打倒汉奸等口号，民气激昂，实空前盛举云。”

(二)

1936年1月，经县中心民众教育馆同意，由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葛一虹出面，通过章泯，邀请上海业余剧人话剧团来嘉定演出话剧。

征得上海业余剧人话剧团同意后，当时的《太嘉宝日报》刊登了演出预告，并在嘉定四城门张贴海报，预告演出消息。当时，赵丹与蓝苹（即江青）合作演出的《玩偶之家》，在上海公演后，引起了轰动，故海报中有“曾饰娜拉女主角的蓝苹小姐将来嘉演出”等语。但1月2日正式公演时，蓝苹因事未到嘉定。

这次演出的地点仍在孔庙明伦堂，共演出了《蠢货》、《文归》、《生之意志》等名剧。编导、演员有赵丹、顾而已、徐韬、陈鲤庭、苏茜、许秉铎、洪遵、乔汶荃等人。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翔惠民中学校长、地下党员陆象贤等领导的微音社恢复活动，组织了辉煌剧团。其演员队伍以进步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

1946年1月，辉煌剧团在南翔胜利剧场演出了以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春梦》，该剧由地下党员宋学濂（南翔惠民中

学教师)导演。钱乃之、汪秀吾、朱庆溶主演,观众近千人,引起了较强的反响。

嘉定竹刻盛衰琐忆

顾振乐

提起嘉定竹刻,总使我心里激起一阵不小的波动。明代万历、嘉靖之间,经过朱松邻、朱小松和朱三松一门三代的努力开创,使嘉定竹刻这一朵艺术之花,萌发开放,成为百世艺术珍品。褚德彝在《竹人录》序言中说:“嘉定朱松邻所作亦精巧,为时所重,邑人仿效者尤多。练水竹刻,名闻宇内。”迄清代乾隆、嘉庆间,为其鼎盛时期,名家辈出,其雕刻之精湛,令人咋舌,故无不视为拱璧,一时列为贡品,为世所珍。

从明末至清乾、嘉,前后约160多年,代代相传,竹刻之器物愈备,艺术之造型愈妙,刀法之变化愈精,而声誉亦愈隆了。在这个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嘉定竹刻的风格亦有变化,形成几种流派。如朱松邻之工书善画,并擅篆印,首创高浮雕刀法,一改竹刻的浅雕法,使画面产生强烈的立体感。其子纓(小松),擅篆书、行草,绘画则更胜乃父,竹刻得家传之秘,且尤善于竹根雕刻,依形成型,别出心裁,其构思之巧妙,刀法之娴熟,见者称绝。其所制佛像,线条流畅,造型生动,逼真而高古,叹为鬼斧神工。其孙雅征(三松)善画山水、竹石,刀不苟

下，兴来始为之。其高浮雕刀法，常别出新意，技益精进，而艺术水平亦更高，真是出类拔萃，一时无出其右。在朱氏三代的影响下，随而学者愈众，至乾隆而尤盛，一时高手云集，著名遐迩的竹刻家如沈兼、吴之璠、周乃始、封锡爵兄弟、顾珏、施天章、周芝岩叔侄等辈，皆为--时之瑜亮，名播天下。

当时同邑的文人学士，以竹刻为遣兴之雅举，涉猎者大有人在，如钱大昕、瞿中溶皆是也。他们互相观摹品赏，探讨技法，所以在刀工上有所创新，除平刀浅雕、浅浮雕和深浮雕外，还有缕空的透雕，在深不满四五分的竹面上，刻得层次分明，景物深邃，在艺术上的造诣更高，往往以书画的笔法与雕刻的刀法融为一体，开创了以刀代笔的新颖风格，进一步发展了嘉定竹刻的艺术，更丰富了嘉定的文化领域。

其间，如杨褒(字圣荣、号古林)以家贫，乃创制竹章篆刻，谋以养亲，成《竹章印谱》二卷。他所制的竹章，钮制悉遵秦、汉，别有韵味，雅而不俗，得之者皆视为怀宝。吴之璠(字鲁珍，自署东海道人)以工笔见长，开创薄地阳文，人物花鸟皆秀逸遒劲，为世所宝，其作品笔筒曾入内府，款署“槎溪吴鲁珍”。乾隆极爱之，问左右：“鲁珍何人？”侍臣无以对，乃遍查遗书，在《南村随笔》上发现，据以入奏。因此鲁珍之名，传遍全国，一时传为美谈。又如封氏兄弟(封锡爵、锡禄、锡璋等)工诗善画，创竹根人物，所作“采药仙翁”、“天女散花”等，见者超然有出尘之想，名不虚传。以上诸家的风格，都对“嘉定派”竹刻有所创新和发展。

其后有周颢(字晋瞻、号芝岩)崛起，对山水人物花鸟，皆擅胜场，竹石更得宋元神髓。由于他用画法刻竹，合南北宗为一体，被时人推为竹人中首屈一指者。他所制的竹刻，能见深

浅浓淡，勾勒烘染的工夫，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有笔所不能及而刀能及之功。笔之妙在乎神韵，其法度之变化在于纸，而周顥的镂刻，往往出于意想之外，故人而无耳目，屋而无窗棂，树有细点，桥多隐约，此皆为他人所不能望其项背者也。周顥家境贫困，但未尝以衣食累人，读书不应科考，不存功名思想，虽富贵者授以多金求刻，必辞而不予。忽一日，路遇一丐，见其手持竹杖，光润坚老，殊觉可喜，即向渠借观。坐人家屋檐下，出所带刻刀，随手镌刻，成而还之。后即被人发现，出重价购去。他歿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终年八十有九，一生勤奋，故作品较多，传世精品也较他人为多。其侄周笠(号牧山)，小芝岩十余岁，亦工山水，初学黄尊古，后师法元四家，得力于干笔皴法。少年时随芝岩学画，学刻，而不相因袭，各得其意，人称“槎南二周”(嘉定城南，离南翔镇六七里有“鹤槎山”，故名)。芝岩有学生多人，如严敬安、浦鹤汀、吴嵩山、杜世绶、徐云樵等皆有画名。

由于以上诸家的力作，使这一时期的嘉定竹刻，不仅名播天下，万人争藏，即朝庭内外，亦竞相罗致，或以收藏，或作贡品，以致身价百倍，视为珍宝。

乾隆、嘉庆之间，尚有张陈典、时其吉、时其祥、蔡时敏、徐裕基、张宏裕、周愕、马国珍、张步青等，尚能继守前人法度，或浅刻、或深雕，或工书画，各尽其妙。这一时期，所以能使竹刻艺术不断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竹刻离不开书画，而书画尤为竹刻之本，所以从朱松邻起，直至乾嘉，竹刻家都擅书善画，做到以刀代笔。由于艺术是相通的，没有深精的艺术修养，就不可能出现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竹刻。

二、在前人的刻竹技法上，变通运用，直至非常娴熟，而后能自创新法，形成新的特点，超乎前人之上。如果没有前人的法则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更高的水平。

三、兴来为之，不急于求成。不轻易落刀，必先深思熟虑，而后或大刀、或小刀，成竹在胸，意在刀先。时其吉、时其祥兄弟，每成一器，快者两月，多则经年累月，其出必精。

嘉庆以后，虽还有周镗、王圻、马国珍、庄绶纶、时以成、张学海等能工巧匠，以为清代后期的中流砥柱，但以整个嘉定竹刻水平来讲，技术却出现逐步退化的趋势。由于前期嘉定竹刻的深远影响，加以官场馈赠，名流的搜罗珍藏，故而求者日众，这就客观上促使其走上商品化，竹人转化为竹贾。到清朝末叶，大多数公开设肆营业。如晚清的张学海、朱世琰及其后的韩玉、潘松筠辈，他们既是刻竹名手，又自设店坊，生产一般的竹制工艺品。这种工艺品，大都随便制作，不求精工，只冀速成，不计工拙。因而再不会出现经年累月的精心之作，亦就谈不上什么艺术风格了。辛亥革命前后，经营此类竹刻工艺品的店坊，在城厢西街，从县前口到武衙门一带，竟有一二十家之多。但一些名手老艺人相继物故，后继者大多庸工匠手，缺少文化艺术修养，多数作品粗枝大叶，价廉易售，故而艺技退化，产品亦以日用小商品为主，如针线盒、烟盒、雕狮头竹筷等。另一方面由于几度兵燹，当局不但不予扶植，反而横加摧残，阻碍了刻竹事业的发展。最为严重的是后起无人，致使曾享盛名三、四百年的高贵艺术濒临绝境。

开店设肆，扩大营业，并非坏事，但当以培养人材为主，才能继承大业，使之持续发展。竹刻是我国特有的艺术工艺，收藏于海外者亦不少，皆视为名贵文物。“嘉定竹刻”之名，物亡

而名存，十分可惜。若只图厚利，出品粗劣，则无异自绝矣。

设肆营业，始于清末。光绪年间比较著名的有时甫堂创始的“文秀斋”，后归其子时湘华继业；张学海创始的“张文玉”，后归其子张春泉、孙张晓生继业；还有叶瑞甫创办的“晴翠斋”；朱厚甫创办的“酉阳俎”；韩玉创办的“云霞室”；范雅堂创办的“文元斋”和“申竹芴创办的“瑞芝斋”等。

我的家乡就是嘉定，幼年就读于嘉定，对20年代至40年代的竹刻情况，脑子里尚留有很深刻的印象。回忆30年代前后，在西大街一带尚有六、七家竹刻店，如老县前的“文秀斋”，店主时湘华继承祖业，对刻竹技艺尚能保持家风。可惜中年以后下肢瘫痪，行动不便，为了照顾营业，乃于店堂后设置卧榻，遮以布幔，尚能半躺着操刀，擅于浅刻，其作品尚不俗。晚年自号“卧游”。又西大街原县商会对面之“张文玉斋”，自第三代店主张晓生去世后，归店夥韩梅阁、韩海臣兄弟继续经营，因制作比较认真，工艺尚称细巧，仍负时誉，其作品曾两度参加巴拿马和旧金山博览会展出，深受国际人士之好评，并荣获博览会奖状。在盛名之下，其产品一度在上海永安公司设专柜展销，国际人士慕名争购，颇为兴隆于一时。还有设在孩儿桥弄口的“叶晴翠斋”竹玩店，后由叶田生、叶怀生兄弟经营，解放后，叶怀生弃业去兰州工作，1981年曾回家乡，则年近古稀矣，回忆旧业，不堪回首。此外，竹刻名手申竹芴创办的“瑞芝斋”，其后裔由伏虎庙西首迁至光明印刷厂隔壁继续营业。还有武衙门对面和顾正丰米店东邻都设有竹刻店，但皆因产品粗劣，因而业务清淡，相继停歇。而设在孩儿桥的一家，由江苏省平望万氏所经营的竹刻店，后迁至南大街塔院附近，则规模不小，为四十年代竹刻店的佼佼者，双开间门面，座西朝东，

一半设店堂，一半设工场，则业务不淡，竹刻小品及翻黄制品，皆有一定销路。业主万文元，其子万振声，字啸云，能书善画，尤擅小楷，与余年龄相若，交称莫逆，并同受业于嘉定山水画家赵梦苏门下。他所刻小楷扇骨，有名于时。抗战后，即弃业从商，并于解放前夕随时装商人去香港，其父亦因年迈而返故里。

清末，有潘松筠者，自幼习竹刻，聪颖有才气，能使大刀小刀，并谙书画，娶妻某氏，亦能刻竹，长于平刻。夫妻双双在察院弄东首开设店铺，经营竹刻达数十年。妻歿后即告闲歇。不久，太仓县立中学校长章赋浏聘请潘松筠担任该校竹刻技术课教员，数年后告老退休，歿于故里。他的儿子，就是嘉定竹刻唯一的近代传人潘行庸。

潘氏初名郟，号行庸，字味庵，别号拙叟，生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先从乃父母学业，工小楷，善摹古本，山水学虞山派，颇能逼真，其他如人物、博古等亦多佳作，30年代已著名于世。自潘松筠歇业出任太仓中学教师后，行庸即转业于时文秀斋，受到主人时湘华的器重，授以浅浮雕技艺，于是艺有大进，以家传之法，融合师传之方刀、圆刀以贯通运用，特别在浅刻及浮雕上用工苦练，从而在嘉定派竹刻技法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当时嘉定的文人、富商以及地方绅士对潘氏极为推崇，愿以高价收购他的作品。我在1935年前后，亦慕潘氏之名，以数月收入，购得潘氏精刻之山水扇骨两柄，一为浅刻，一为浅浮雕，都是他中年的力作，一直宝藏至解放以后。他的作品，工写结合，水纹、松针、寒鸦，细比发丝，而流动不乱，历历可数。山石、树木，则寥寥数笔，神态逼真，而无矫揉造作之态。潺潺流水，树影掩映，布置得宜，令人神往。可惜的是中

年体弱，形瘦鹄面，或以恶习所害，虽在不惑之年，已有衰老之感，手指象腊样的黄，脸上皱纹密布，颧骨高高隆起，而两目则出奇的有神。他为人忠厚、诚恳，怀一身高超的技艺而虚怀若谷。我不仅爱其艺，亦尊其人。

但生不逢时，社会动荡，生计不安。尽管他孜孜不倦，刻出了不少精湛一流的作品，但经不住经济萧条、政治黑暗的局面，而况势孤力薄，始终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尤其在敌伪时期，竹刻行业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潘氏的处境，更加困难，勉强制刻一些筷子、扇骨等日用品向一些老主顾兜售，聊以糊口。有时还将不及完成的半制品亦急于兑现以维最低的生活，其艰难困苦之状，着实令人痛心。这时候，他的店铺仍设在老县前，左边是布店，右首是镶牙店，小小的店面，前临大街，背靠城河，一座柜台，一口木橱，靠里一只账桌，他坐在柜台里边操刀，一面照顾营业。他亦曾带过徒弟，知名者有范勋元、范其昌、张迎尧。他们师徒几人在困境中挣扎，苟延残喘，一直坚持到解放。

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教育，戒除恶习，再度为嘉定竹刻传统工艺的复苏而奋斗。不久便与若干同业组织嘉定城区手工艺竹刻生产合作社，生活趋于安定。由于他对竹刻工艺作出了一定贡献，曾先后被聘为第一、二、三届县政协委员和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1959年，经政府安排，将生产合作社并入上海玉石雕刻厂。时潘氏已七十高龄，曾被选派去北京参加全国手工工艺品老艺人会议。这是他晚年最为荣幸的机遇。嗣后，告老光荣退休，回家乡安渡余年，于1961年因病逝世。

南翔的名胜古迹

钱乃之

南翔，历史悠久，因寺（白鹤南翔寺）成镇。不仅流传很多美丽的神话，而且有不少名胜古迹。晚清时期流传的一首《南翔山歌》中，开头就说：“正月梅花初立春，南翔虽小赛苏城”。虽属过誉，但据镇志记载，当时私家花园有十多所，还有“博望仙槎、萧梁古寺、东林银杏、北园老桂、西院芙蓉、南坞屏梅、槎阜社灯、鹤湾渔艇、太平竞渡、天恩赏月、萧寺钟声、薛湾潮汛、桂苑占秋、鹁林消夏、止舫观鱼、平桥折柳、双塔晴霞、三槎霁雪”等18处名胜古迹。尽管其中有的是牵强拼凑，以为地方生色，然而有的还是名副其实的。许广平游览南翔后，给鲁迅的一封信中说：“此行甚快活，近来未有的短期惬意的旅行也。”由于地处上海市郊，为兵家必争之地，屡经战火，抗日战争后，已经疮痍满目，大部被毁，对幸存的部分，又缺乏保护措施，日渐湮灭，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引起重视，进行保护。有的经过修建，展现了新姿。现在尚存的有：

一、五代砖塔：即所谓“双塔晴霞”，座落于香花桥北堍，解放街两侧，旧镇志只说是“千年物也”，“不知建于何代”。现经专家鉴定，属五代（907至960年）建筑。原形8角7级，每级有神龛，高3丈许，大可3抱，塔旁各有梁朝井一口（现在都用石块封

口，埋在街道下面），是白鹤南翔寺（后称南翔寺、云翔寺）山门口的旧物。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香花桥上民房失火，四周建筑被焚，唯独双塔幸存。此后塔旁建起了民房，两座砖塔的北半部都被砌入民房之中，互相依傍，才得以保持下来。虽然年久失修，出檐早已脱落，但仍保持着江南地区典型的楼阁式砖塔的特色，看去似与杭州的雷峰塔相似。1962年9月7日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东面的一座因在商店内部，西面的一座因前面竖起了语录牌，幸免破坏。1977年12月恢复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起，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嘉定县人民政府和南翔镇人民政府的努力下，经过近5年的设计、动迁、备料、修理，已于1988年12月7日竣工，修葺一新，基本恢复了原状，它是上海地区千年以上的古塔之一。

二、鹤槎山：座落在北市梢沪宜公路东侧，是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抗金名将韩世忠所筑供军事联络、通讯用的烽火墩。山麓有香雪庵，1853年（咸丰三年）南翔罗汉党曾在这里聚集1000多农民举行嘉定县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太平军也曾在这里阻击过英法侵略军。山上一棵古银杏，留有当时的弹痕。旧时，每逢重阳，当地人就在这里登高，清代当地诗人张揆方曾作诗记述重阳在这里登高的情景说：“节值登高恰恰晴，鹤槎山麓缀霜英，花粘溪女银钗脚、叶乱村翁蜡屐声；一压担花糕入廛市，盈筐紫蟹上江城，老夫也逐游人队，一种痴情莫与京。”抗日战争以前，每逢丰年的上元节，各村社灯在这里聚会，而后上街环游。因而“槎阜社灯”也列为一景。清代当地诗人吕王辅曾作《槎阜社灯诗》说：“松筠绕阜碧层层，星月光中拾级登，隐现千村宝炬列，依稀万顷火云蒸。龙幡惊攫眠珠

去，马度疑乘汗血腾，试问插萸吹落帽，何如眼底上元灯。”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和庆祝解放也举行过灯会，但都不在上元节，也不以鹤槎山为中心。南翔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妄图阻挠解放上海，在山上筑有碉堡一座，至今犹在。1961年经嘉定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在四周筑起围墙加以保护。

三、古猗园：原名猗园，座落在民主东街西端，建于明万历年间，由嘉定著名竹刻家朱三松设计布局；园主是河南府通判、光禄寺酝署署正闵士籍。后转让给“嘉定四先生”之一、万历举人、著名画家李流芳的侄子、贡生李宜之。后又转让给陆姓、李姓，于1746年（乾隆十一年）冬，为洞庭山人叶锦购得后，拓宽园基，大事修葺，并增建了逸野堂，1748年（乾隆十三年）秋竣工，因隔了一个朝代，就改名为古猗园。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由当地人士集款购下，作为州城隍庙的灵苑，成为当地的公园。1806年（嘉庆十一年）又经募款重修。该园由于结构精雅，古色古香，素负盛名，远近游人络绎不绝。当时园内以戏鹅池为中心，池内植莲，夏日雨后，翠盘盛珠，粉荷亭立。池北的石舫，又名不系舟，原为园主的书画舫，小巧玲珑，被誉为“止舫观鱼”一景。池南有竹枝山，西南山麓有南厅一座。1645年（顺治二年），清兵南下，南翔镇的奴仆奋起开展索契斗争，当时园主李宜之在南京，奴仆们将其家属集合在南厅中，要他们退还卖身文契，遭到拒绝，因而激起众怒，杀其全家，埋葬在竹枝山麓。所以南厅曾一度被地主豪绅称作“难厅”，把竹枝山上种植的白边叶子、高不过膝的矮竹，称作“戴孝竹”。竹枝山顶，建有四角方亭一座，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地人士陈少芸为纪念东北沦陷而集资兴建的。亭顶故意少塑东北

一角,其余3只角上各塑高举的拳头一只,命名为“补阙亭”,以示收复失地的决心。后经“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抗日战争,古猗园遭受日本侵略军的严重破坏,除逸野堂前的一棵盘槐和“五老峰”、“小云兜”两处假山,以及补阙亭幸存外,其余都成了废墟。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经募款修建,但因限于财力,仅修复了南厅、白鹤亭、石舫,新建了微音阁,仍难以恢复旧观全貌。新中国建立后,经市、县人民政府拨款于1957年起逐步扩展,园基由原来的27亩,扩展至一百多亩,原有的建筑全部修饰一新,移栽了大量花卉树木,在竹枝山南麓,还开挖了更大的水池,与戏鹅池相连,池上筑九曲桥,桥中央有湖心亭,桥畔有五曲长廊,廊边移植了花龄百岁的大红牡丹,临池设有茶厅,池南有黑松岭,岭上有大假山,可以穿行而上,岭南有大草坪,坪西有儿童乐园,坪南有仿砖刻照壁,面向沪宜公路建筑了高大的南大门。园的东北部,又增辟了松鹤园,重建了梅花厅、逸野堂,还设有餐厅,供应酒席饭菜和久负盛名的南翔小笼馒头,并将属白鹤南翔寺旧物的唐代石经幢和宋代普同塔移置在园内。石经幢共两座,原来东西对峙在白鹤南翔寺观音殿后,大雄殿前,从867年(唐咸通八年)动工,至875年(乾符二年)落成,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重修;1333年(元元统元年)为了建造大雄殿而向前迁移,添新易旧,次年重镌经文,高3丈,仰莲基座,6角幢身,飞檐幢顶,造型秀丽,上镌尊胜陀罗尼经和四大天王等佛像。两座经幢内容不一,高低稍有参差。新中国建立前,已经倒坍,散在白鹤南翔寺旧址,1959年由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搜集整理,分别移置在南厅和微音阁前。南厅前的一座,于1968年遭雷击,上面3分之1倒坍,两座石经幢上的佛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破坏。

宋代普同塔，为6面7级的石塔，建于1222年（宋嘉定十五年），原在白鹤南翔寺九品观荷花池内，全塔高仅一丈，上镌如来佛像，小巧玲珑，雕刻精美，因屡经战火，早已坍毁。1959年由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搜集整理后，移入古猗园内，在松鹤园西首荷花池中。石经幢和普同塔都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胡阙文副委员长曾为古猗园、微音阁题匾，朱学范副委员长也为该园题词，为微音阁题匾。

四、大平桥：建于1505年（明弘治十八年），座落在镇中的人民街东端，东有吉利桥，西有隆兴桥，形成“八”字形，因而俗称八字桥。走马塘、封家浜、横沥、上槎浦在这里汇合。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端午节前后3、5天，有东市的青龙、乌龙，南市的黄龙，西市的绿龙，北市的紫金龙，中市的白龙（后在鹤颈湾沉没），日夜在这里举行龙舟竞渡。由各市脚班（搬运工人）驾驶、打唱班在船上奏乐，豪绅富户还雇了画舫尾随其后，桥上桥下，人山人海，极其热闹。清代当地诗人吕王辅曾为之作诗说：“万户嚣尘水一泓，惊闻金鼓忽齐鸣，玉虹四绕星旗转，画鹢重围龙箭轻；手捧蒲觞看泛泛，鬓簪艾草望盈盈。汨罗独醒成千古，何用弹丸吊太平”。因而“太平竞渡”作为南翔一景。抗日战争中，龙舟全遭焚毁，从此不再举行龙舟竞渡。

五、天恩桥：又名真圣堂桥，建于1644年～1662年（清顺治）间，座落于北市梢，沪宜公路东侧，是一座三孔拱形石桥，离地高5.5米，雄伟壮观。“天恩赏月”被列为南翔一景，清代当地诗人吕王辅曾作《天恩赏月诗》说：“不是垂虹锁巨川，半湾脚底涌婵娟，置身直拟浮槎客，抚景宁追掷杖仙。色冷印残千里迹，影低画破一溪烟。未邀好酒丹阳尹，莫野风光笑独专”。解放前夕曾被国民党军队炸断桥顶，1951年10月1日由

嘉定县人民政府修复。并于1961年经嘉定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还有些踪迹可寻的有:

一、萧梁古寺,即白鹤南翔寺,传说梁天监年间,南翔还是个农村,有个德齐和尚来到这里,看到当地人挖到一块一丈长的石头,有一对白鹤在它上面飞舞,认定是块佛地,就化缘在那里建造佛寺,每天白鹤飞向哪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有人来献款,到505年(梁天监四年),佛寺建成,德齐和尚骑上白鹤向南飞去。那块石头上现出一首诗说:“白鹤南翔去不归,唯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熏修享二时”。因而给佛寺题名“白鹤南翔寺”。836年~840年(唐开成)间,佛寺倒坍,又有一对白鹤飞到香花桥南首莫家弄内的莫少卿家,莫少卿就献出巨款,重新修建,并且拓宽寺基,占地180多亩,以太平桥、塔桥、四虎桥、小金黄桥为界,竣工之日,主持和尚行齐也乘白鹤向南飞去,从此一去不归。当时佛寺规模宏大,有和尚700多人。1228年~1233年(宋绍定)间,因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为它书写匾额“南翔寺”而改名南翔寺。1436年~1449年(明正统)间。江南巡抚周忱曾发起重新修饰。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皇帝为它亲书匾额“云翔寺”,从此即改名云翔寺。历代名流,多有题咏。清代末年,全寺已毁,现在只剩下山门口的两座砖塔,已经修复。另有已经改观的圣贤殿、鲁班殿、文昌阁等云翔寺的后期建筑还可看到。

二、博望仙槎,说的是汉武帝命博望侯张骞乘槎(即木筏)寻找河源,传说曾经过这里,后遇见牛郎织女,因而以“博望仙槎”为一景。现在沪宜公路的仙槎桥是建筑公路时才有的,原来的仙槎桥在现在的公路桥北3、40米处,相传这里原来有一

棵古树，枝干穹窿绕于两岸，人可以在上面通行。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在这里建造了拱形石桥。明代诗人刘铎曾作《仙槎桥怀古诗》说：“浦上人家近市饶，浦中流水不通潮，仙槎一去无消息，秋雨秋风满石桥。”抗日战争中被炸毁，后因与公路桥相近，所以不再修复，只有桥基依稀可见。

昼 锦 坊

李宝兴

方泰镇上曾有一座建筑雄伟、工艺精湛的表坊，名为“昼锦坊”，属官阶坊。据清光绪六年（1880年）《嘉定县志》记载：全县原有官阶坊18座。乾隆七年（1742年）编修县志时尚存6座。光绪六年续修县志时仅存2座，“昼锦坊”是其中之一。

“昼锦坊”，为表彰方泰镇陈荣（字国华，号海涓、芳溪，明弘治十一年中举，官居兵部司务南京工部员外郎、尚书郎）的功绩所建。始工于明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竣工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距今400余年。据民国4年（1915年）陈乃钧编《方泰志》记载：“高大玲珑，东吴第一”。

“昼锦坊”座落在原方泰镇南街，位于东街入口处，座北朝南，用巨大石块精工雕琢，镶嵌而成，高10米。基石深达数米，两个石墩上，两根双人合抱有余的八角形石柱，巍然屹立。石

柱中间，镶嵌一石，两面皆刻浮云、灵芝等花纹。其上，镶巨石一块，两面中央各刻“双狮戏球”浮雕一幅；左右刻“丹凤朝阳”浮雕各一幅。彩球、凤尾雕成镂空，六幅浮雕栩栩如生。再上，中间镶嵌青石匾一块，正面横刻“昼锦”两字，背面则横刻“尚书郎”3字。石匾两旁各接一石，两面均刻“麒麟送子”、“鲤跳龙门”图案。石匾上方复镶一石，大小、花纹与石匾下面的一石相同，浮雕之上，一块刻有荷花瓣花纹的巨石，横卧在石柱上，呈“拱门”状。“拱门”之上，两块“龙凤呈祥”图案镶边的石额，呈前俯状相背而立。正面的石额上，竖刻“敕旨”两字；背面的石额上，竖刻“恩光”两字。石额上端，以刻有瓦片花纹的薄石遮檐；与石额平行，4块长方形石块等距离竖立两旁，正反各刻头角崭露的梅花鹿、4蹄奔腾的骏马、枝叶繁茂的古树、含苞待放的花卉的图案4幅，8幅浮雕玲珑剔透。紧挨石额的空隙，两座“指日高升”的石像分列左右，气宇轩昂。另外两个空隙之间，饰有石虎、石豹多枚，或喜或怒，或争或斗，姿态各异。与牌坊顶端中央的石檐平行，左右各置石算盘一把，镌刻精致，粒粒算珠可以拨动。石檐上，用精雕细琢而成的石元宝结顶，构成整座表坊。

“昼锦坊”历史悠久，外貌壮观，巧夺天工，是一件宝贵的文化遗产。百年来，神奇的传说在方泰民间竞相传颂。相传建造表坊的石匠夫妻，原籍崇明，离乡背井，在方泰含辛茹苦，劳碌一生。他俩为自己凿了两具石棺，死后埋葬在距表坊百米的东南隅。棺内长一棵小树，枝茂叶盛；又说表坊上长出一株桃树，只开花，不结果。“方泰牌楼造得高，十里方圆不生桃。”的歌谣妇孺皆知；还说3丈高的表坊能矗立不倒，是石墩下面埋有两只“金浴桶”镇底……。

“昼锦坊”建于明代，跨越清代、民国，延至新中国成立历时4个世纪。世事沧桑，风云变幻。在历史长河中，多次泛起不平静的浪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火波及方泰，表坊初经火焚，石块受热风化，上部饰物有所损伤。民国8年(1919年)元宵佳节夜，“天成堂”国药号失火，祸及表坊，复遭烤熏，虽然“救旨”、“恩光”石额以上的饰物，毁坏甚多，但以下结构仍完整无缺。民国13年(1924年)的齐卢战争、民国21年(1932年)的“一·二八”和民国26年(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淞沪战役，表坊幸免于难。1960年1月，“昼锦坊”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因表坊上部构件摇摇欲坠，无法加固，唯恐危及街上行人，将部分构件拆卸，由县博物馆保存。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表坊被视作“四旧”之物而厄运难逃，终至粉身碎骨，荡然无存。

电影明星参军

蓝 翔

担任主攻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廿军，在1949年5月底解放上海后，退出市区，驻防嘉定。我们军文工团正赶排歌剧《刘胡兰》，准备下连队慰问演出。这时忽然有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到排演场：“电影明星蓝马来参军了。”

这是真的吗？影迷都知道，蓝马和吴茵、上官云珠主演过《天堂春梦》、《万家灯火》等影片，是解放前享有声誉、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他真会来当兵吗？

消息不胫而走，同志们半信半疑。部队还有许多艰险的战斗任务，大明星吃得起苦、上前线不怕流血牺牲吗？

一阵集合号声，把全体文工团员召唤到嘉定天主堂。“热烈欢迎蓝马参军”的大会就在这里召开。我们在电影中多次看到过他的精湛演技，可“庐山真面目”还是在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的。蓝马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他这次来参军，把他在上海的一切衣物、家具、自行车等全部家当都卖了，所得之款，全买了公债。

欢迎会上没有什么布置，只挂了上海人民欢送蓝马参军赠给他的一面锦旗，上书“购债模范”4个大字。这面小小的红旗，真象一团火，透过它，我们仿佛看到蓝马熊熊燃烧的一颗火热的心。所以当文工团长致欢迎词说：“蓝马同志把一切献给党、献给解放军”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表演节目开始了，蓝马唱了一段京韵大鼓，他嗓音圆润，韵味浓郁，大家听了十分赞赏，纷纷鼓掌拉他再来一个。我们还当他演什么精彩节目呢？出人意料，蓝马双手着地划了一个虎跳。这位著名演员，身材高大魁梧，翻跟斗显得有点笨拙，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表演并不拿手的体操项目。这时蓝马气喘吁吁地说：“我原是旧社会的电影演员，现在解放了，我获得了新生，我翻跟斗，是表示我从此大翻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看得出，这番话出自肺腑，他那含泪的双眸和真挚的情感，可以说比他主演的任何一部电影，更为感染观众。

蓝马参军后，授予营级待遇的戏剧教员职务。解放初期，

军队是供给制，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的津贴。蓝马烟瘾很重，参军时带来的几条大前门，不出月就抽光了，他只好求助于他的警卫员，这位老兵给他做了杆旱烟筒，共同买点黄烟对抽一阵，蓝马美其名曰：“我们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

蓝马上戏剧课时，幽默风趣，对我们提高表演水平帮助很大。他经常举着手，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暗自表演。有次我们突然将他包围，要他公开秘密，他无奈只得泄露天机。他说：“我身材体形和毛主席比较接近，参军后的最大愿望，就是想扮演毛主席。”

不久，蓝马上调总政话剧团，曾在电影《万水千山》中成功地扮演了红军教导员李国有。在十年动乱中，他不幸因病去世。蓝马同志虽然没能实现扮演毛主席的愿望，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已在银幕上闪耀光辉，这无疑对这位表演艺术家是个莫大的安慰。

先祖父徐文谷传略

徐植义

先祖父徐文谷，字颂诒，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先世居住嘉定城中，高祖守朴，在黄渡镇开设米店，全家迁居黄渡。太平军占领苏州，准备进军上海时，全家再迁居奉贤县南桥镇，曾祖旭东先后在当地开设瑞兴、德兴两家杂货店，分别设

立茶食和蜡烛作坊，营业兴旺。

先祖父虽然出身商业家庭，但喜欢读书，因为寄居他乡，不能应考，就纳资捐了个监生，获得候选儒学正堂虚衔。为了使子孙辈能从正当途径进学，征得高祖和曾祖同意，迁回嘉定城中，建造了住宅，聘请廖契韶执教，先父泗寅（号逮三）因而得中秀才。时值康梁变法。废科举，提倡新学，嘱先叔泗俊（号友青）在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就读后，留学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后因先祖父病故，回国奔丧，返日改入东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回国，在真如从事园艺，种植树木，曾任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场长及总理陵园设计委员会委员。

先祖父不以教读儿孙为满足。1904年（光绪三十年）夏，和志同道合者协力开设中城小学。又将南桥两家杂货店的一半资金，于同年秋，在本宅内独力创办蒙正小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中城小学停办，先祖父又独力创办坤正女学，设高等及初等小学各四年级，自任校董，聘瞿鹤汀、吴珥卿先后任校长，梁汉章、王焕章、王彦孙、瞿时茗、金颂声、胡雪帆、庄逸璜、汤致和、罗直卿等为教师，广收亲邻就学，以新编各科教科书为课本，因地处城中心，就读学生很多。

为了解决贫苦孤儿入学就业问题，先祖父于1906年夏，集资创办培本艺徒学校，免缴一切费用，供给学生膳食，延师教读识字，并学习黄草编织和藤器制作手艺。还在集仙宫的废墟上，设立济生善堂，办理施医舍棺，施戒鸦片药，推行各种慈善事业，争取上海济生善会会董程翼乾的支持，资助木材，重建玉皇殿三开间及东、西次间各一间，除供奉神位外，用作培本艺徒学校的教室和工场。曾被推选为嘉定商务分会总理教育款产处董事和育婴堂董事。

先祖父素有足疾，行走不便，常以自备小船代步，为筹划办理公益事业煞费苦心，终因疲劳过度，于1910年（宣统二年）在乘船赴沪途中，泄泻不止，抵沪后不及施治，竟至弃世，终年53岁。地方人士念他倡导新学、热心公益的功绩、在汇龙潭边积谷仓内开会追悼，并将其事迹载入《嘉定县续志》。可惜他所创办的事业在他病故之后无人继承，以致停办。而今教育事业日益昌盛，职业教育也受到重视，不能不念及先人提倡的功绩，因作传述，以志纪念。

商务印书馆的第二个总理

——印有模小传

陶继明

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个总理是青浦人夏粹芳，第二个总理是嘉定人印有模，字锡璋，生于1863年（清同治二年），娄塘镇人，出身于富商之家。他从小随父在上海日新盛布号学习经商，受到“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想的熏陶。20岁时，他在上海、娄塘等地开办纱厂、农场，从事实业。他曾自费到欧美考察西方先进的工农业技术，并从美国引进了棉花新品种，在嘉定四乡试种，获得成功，《嘉定县续志》曾专门记载了这件事。

印有模因印刷广告、单据等商务事宜，开始与印刷业接触，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粹芳。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个弄堂小厂，印有模看到夏粹芳办事很精干，便支持商务

印书馆的发展，在商务印书馆资金发生困难时，印有模曾资助过夏粹芳。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商务印书馆扩大规模。印有模就向商务印书馆投资，成为该馆的主要股东。他目睹当时中国印刷业的落后，决心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印刷业而努力。有一次，他看到一家外国印刷厂正在租界拍卖印刷机，马上从其他行业中抽出一部分资金，把这套机器买下来，交给商务印书馆使用，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首批自动化印刷机械。

为扩大商务印书馆的事业，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经他与日本三井商行的山本条太郎磋商，商务印书馆由日本金港党合资经营。此后，商务印书馆以雄厚的资本逐步扩充机器设备，培训技术人才，并扩大业务项目，承印各种教材、工具书、外文书，以及精美画册、广告等，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印刷业之一。同时，他与蔡元培、张元济等编译人员密切合作，使商务印书馆形成自编、自译、自印、自行发行的出版发行系统。

1912年（民国元年），他在考察了国外先进的电报业后，酝酿在中国也要搞自己的汉字电报编码系统，自任主编，广聘人才，耗资数万，化了3年时间，以成语词的相互关联为条件，终于编成了一部10万余言的《电报编码》。出版后，立即为国内电报业普遍接受，广泛使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1913年（民国2年），商务印书馆总理夏粹芳遭人暗杀，经张元济提名，董事会一致推举印有模继任。他任商务印书馆总理后，组织人力，大量编译“新学”和“西学”著作，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向全国发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使该馆在近代中国文化出版事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1915年(民国4年),大型工具书《辞源》出版发行,他是该书的发行人。正当他为商务印书馆的继续发展运筹奔走之际,不幸积劳成疾,是年秋去日本治病,医治无效,于11月16日客死日本,终年52岁。

印有模是近代中国的一个著名实业家、出版家。他在世时,曾被商务印书馆的同人赞为:“有魄力、有远见、有气度、有经济能力”的人才。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怀忆贤师 肃然起敬

纪念黄允之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

殷志澄

吾邑黄氏原籍浦东高桥,明季黄忠芳公(讳继春)迁至嘉定西门外。11传而至闇伯公(讳世荣),乡谥文惠先生,清廩贡生,识量闳通,学问渊博,为吾邑清末著名经学家。晚年时鉴于清政腐朽,倡导革新教育,促使地方教育事业走上维新道路,遂于1901年独资创设“普通中英学社”于私邸。长子鄒臣(讳守恒)与弟允之(讳守孚)早年先后食廩,复在学社成人班进修英文、算学。允之先生后于1904年自费东渡游学,习法政2年归国,1907年任嘉定劝学所县视学兼学务总董;旋应上海集成图书局延请编辑国文教科书出版,以编制新颖详明,一时风行国内;1908年各省设咨议局,各县先设调查选举事务所,

先生任副所长主办其事，旋被选为省咨议局议员候补当选人；1909年清廷举办地方自治，省会设筹办处，各府属举参议一人，先生被举为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参议。是年冬，嘉定西门乡提前举办自治，先生被选为乡议事会议员；辛亥春南洋劝业会成立，先生任出品审查员；夏奉令组织县农会被选为会长；1912年各地组织同盟会，旋改为国民党，鄒臣、允之昆仲热心提倡，入党者颇众，是时政府组织国会，先生先后被选为参议员、众议院议员候补当选人，旋任省议会秘书长；1914年太仓洪伯言就上海县知事，延聘为第一科科长；1915年改任吴江官产处主任，未几，任新申报馆主笔，是年洪宪政变，允之先生挈眷居沪，以避注目；1917年襄助黄炎培先生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于上海；1918年选任江苏省议会议员，并任暨南大学国文教授，对于全省利弊侃侃直陈，无所顾忌，声望翕然；1923年任新江苏日报主笔；1924年被举为县教育会副会长；是年8月齐卢构兵，我县适处火线，乃避居上海与旅沪同乡组织救济会，不久事平回里，又被推为兵灾善后会副会长，同年与沪嘉同人创办上海中华珐琅厂任董事长，驻厂规划一切；1925年应江苏省长陈陶遗延聘为秘书兼主公报编辑；1926年继任邑人徐锡丞（鼎康）护理省长任内秘书；1930年任江苏省农民银行第七区（嘉、太、宝）分行经理。

1906年文惠先生创办的“普通学社”迁至城中张马弄潘、廖两宅，改办为“私立普通中学”，由于学校注重创新，认真教学，在城厢内外，享有声誉。1917年我届入学年龄，即就读于该校。1919年鄒臣先生继承文惠先生遗志，亲任校长，悉心改革校政，并鉴于当时邑中高级小学为数甚少，远远不能满足初小毕业生深造需要，遂筹划扩充为7年制完全小学，由于“普

通”在10余年办校中成绩显著，并慕黄氏家族之德才，受到各方热心支持，很快募集捐款万元。正当购地建筑新校舍于旧址西首之际，鄒臣先生不幸于1921年秋因病逝世，经校董会一致公推其弟允之先生兼任校长。允之先生在百忙中，为完成兄长建校未竟之事，亲自规划设计，不辞辛劳，终于在是年秋季开学前两幢规模宏伟的教学大楼先后落成，由黄炎培先生亲题校牌。校内设备齐全，有宽广的种植实验园地、化学实验室、木工实验工场、室内外体育活动场地；并选聘名师执教，完备各种课程，提倡手脑并用，注意教学与劳动相重，提倡学生穿短服，养成活泼劳动习惯，使学生在读完7年小学后，可以顺利升学，或为就业打下基础。允之先生为当时的国事、省政，经常奔波于沪宁之间，虽在校时间不能固定，但对校内情况，了如指掌。他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发现个别学生轻视劳动时，用关心态度和他谈心，听取他对学习与劳动的想法，并执着他的手看后说：“凡热爱劳动的手，一定结实有力，还会有老茧。”然后笑着说：“你对劳动的看法，道理上讲得很对，但做的还有很大距离，希望你今后要加倍努力。”就用这样的教育方法，让学生口服心服，自觉地改正，从不严词训斥。对每届毕业生指导升学或安排就业更是煞费苦心，关切备至，根据学生本身特点和家庭情况，精心指导，妥善安排。对不少无力升学的，还想方设法通过他的社会关系安排就业。允之先生对地方事业也极关心，常常以他的正确思想，引向进步。例如1925年，西门外旧吊桥，因年久失修，出现危情，西门人士商议集资重建一条钢筋水泥新桥。事为一位年逾古稀的市民刘子祥所悉，愿将从童年起在桥西赵永泰行做工，一生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的积蓄捐献造桥，受到群众的称颂。经乡议会

讨论决定以“刘子祥”命名此桥。并由允之先生函陈经过情形，请得江苏省长韩国钧亲笔题词镌刻于桥梁，竟遭到有些士绅的反对，认为不能以一个无名工人命名，允之先生闻悉后，以精僻的见解告诉大家说：“刘子祥一生过着勤俭生活，以仅有的积蓄，为大众造福，这种崇高的精神，应该提倡，大书特书，造成地方好风气。”从而说服了大家。

1927年后的数年中，我在铸丰搪瓷厂任职，经常于业余时间先通电话，然后前往中华珐琅厂看望允之校长，谈心聆教。先生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识渊博，使我这个见识浅薄的学生，受益非浅。先生德才并茂，处事公正，令人折服。在任期间，为教育、为地方，于省政、于国事，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受人敬仰。1931年冬，允之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天不假年，享年54岁。噩耗传出，社会上发生很大震惊和哀恸，谏词挽联，纷至沓来，其中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为“检谱而知辈份，论交且逾弟兄，生死两相期，何图国难声中，君为异物；大用祇恐非时，小试亦堪造福，公私一长恸，为问地方善后，谁是传人。”还题像赞曰：“呜呼！我忍题君之遗像也哉，忆吾二人之初订交，在甲辰、乙巳之际，君方留日初归，温润中时露隽爽，自是于国事、于省政，凡有奔走，无役不偕，忽忽二十年，国利何在？民福何在？独年事垂垂渐老，未尝不对语唏嘘也，最近五年，腐心世变，则遁入实业一途，孰意东北风云猝起，全国国人呼号乞救声中，君乃奄然遂逝耶，呜呼！我忍复以私哭君也哉！”足见二位黄先生之道同志合了。

允之先生的一生无私贡献，正如潘指行先生（解放后嘉定县副县长）在哀思录序言中表达的：“先生得天独厚，才思横逸，又读书多而经验富，故思想敏锐而见解透辟，其待人处世，

虽富有感情而衡断事物一出之以理智，故主张正大而态度光明。先生尤工文词、擅辩才，其谈教育、筹实业、谋自治乃至至于社会、政治、经济之种种论议，在议席、在报章之所发表，均足以折服人心、左右舆论，其规划之见诸实施者，无论在省在县，无不颠扑不破，行之而皆获实效；虽先生耿介之性不容于政治污浊之世，生平抱负未克大展，其贡献一省一县而予社会人心以良好之形象者实已多矣；年来先生厌弃政治生涯，遁迹工商、致力农村经济，盖欲从民生之根本着手，以解决社会国家之经济问题，益以见先生眼光之深远。非常人所能及也，斯人长往岂仅一姓一族之戚，实社会国家之大不幸也。”

值兹黄允之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之期，纪念先生一生的崇高精神，借以昭示后生小辈引为学习表率，并志景仰之心。

黄虞孙传

黄守辛

黄虞孙名世祚，号勤之，自号补拙居士，沦陷期间曾更名秦仪生，世居嘉定西门外，是前清举人黄宗起（字翰卿）次子，举人黄世初（字云孙）异母弟，生于1871年（同治十年）夏历十月十一日。他从小聪明好学，又受到父兄的教育和熏陶，文学造诣很深，30岁考中了举人，初任上海申报馆记者。1906年在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任国文教员，该校几经改组，先

后改名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公学、国立交通大学、南洋大学(即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由于他具有真才实学,教课认真负责,得到校方器重,被连续聘任为国文教员,至1927年(民国16年)春止,历时21年多,曾得到上级机关授予嘉禾章,以表彰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功绩。当唐文治(字蔚芝)任校长时,十分注重国文,常举行作文竞赛,奖励优秀学生。因此,学生都努力攻读国文,成为有良好文学基础的工程技术人才,毕业后能担任国家电机、机械、交通有关部门的中、高级领导人员。不少知名人士;均出自他的门下。他在上海执教时,每周有3天回家乡,过问一些地方工作。每任新县长上任后,总要去拜访他,倾听对县治的意见。1927年辍教回乡后,被委任为嘉定县行政局长,后又任县修志局总纂,和同里黄天白等续编《嘉定县县志》,对历史、人物、文学、地理、建设、风俗、方言等有关资料,广为收集,务求翔实;有疑问的,必调查研讨,认可后再编入,以保县志质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编成付印,校勘出版,成为嘉定县的重要文献。

1930年他受聘于上海三育中学,任国文教员,再度为青年学生讲学。3年后,其次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派在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可以独立谋生,并赡养家庭。他以年逾花甲,不愿再奔波嘉沪间,辞职回里,以度晚年。回县后,又被委为第一区区长,负责城厢区行政工作。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嘉定滨临前线,祖国后方开到嘉定的军队,络绎不绝。为军需服务的工作,突然增加。黄虞孙时年已67岁,体力衰退,对紧急而繁重的军需工作,心余力拙。为不贻误抗战大业,不得不申请辞职,以让贤路。嘉定沦陷时,他因夫人有病,行动不便,没有撤

离。所住房屋，被敌机炸毁一部分，夫人受惊病故。日本侵略军遣人邀请他出山，维持地方秩序。他忠贞不渝，耻为汉奸，就改名秦仪生，（笔名练西劫余叟），隐居乡间杜门不出，以全名节。当时有人在上海文汇报上以疾风见劲草为题，赞扬他的高风亮节。

1939年初夏，黄虞孙患高血压，不幸偏中，经医治，病卧3年，于1942年夏历十月十二日逝世，终年72岁。时三女侍奉在侧，长子在北平，闻噩耗奔丧回嘉定，料理后事。次子在西康甘孜查勘飞机场场址，关山万里，音信阻滞，不克奔丧。其遗体，葬于嘉定西门外白荡乡毛司徒。嘉定各界人士数百人，为了悼念他对桑梓的贡献，在明伦堂召开追悼会，輓幛輓联挂满大厅。嘉定《嚆声》报出专刊，报导追悼会的情况。

黄虞孙生前尝对家人说：“非义之财，不应接受，但如为人书写屏联等，则润笔之资，古有先例，可以接受。”后堂自书门联“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以自勉，也以此教育子女。一生自奉俭约，清廉自守。任内调解纠纷后有登门馈赠致谢者，一概严词拒绝，丝毫不受。他热心公益，尤重教育。嘉定有名的几所私立学校如普通、企云、承德等，皆聘之为校董。他对各校的筹建和发展，尽心擘划，帮助学校处理问题、解决困难。嘉定县立中学曾于校庆纪念日邀请先生莅校演讲，勉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为国家出力。

他忠诚宽厚，礼义待人，又热心助人，经常有人请他为儿女证婚，或请他为先人丧葬点主。请他撰文的历年不断，所著序言、传、跋、铭、诔、寿文、行状、喜联、寿联、輓联以及诗赋等，不可胜数。他尤工书法，正草隶篆，均臻上乘。常为人书写扇面、屏条、对联、中堂、匾额等，人皆珍惜之。同里赵卓孙是有

名的画家，其作品，再由黄虞孙题诗，人称珠联璧合，视为珍品。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日益暴露。当时县长许次玄在政务会议上作出决议，会同胡厥文、黄世祚、潘指行等本县各界爱国有识之士，建造侯黄纪念碑、石童子碑，整修叶池等，以唤起民族爱国精神，勸勉大众继承历史往迹，抵御外侮，确保河山完整。其中侯黄纪念碑及石童子碑二方碑文，均系黄虞孙撰写。1934年锡沪公路建成通车，跨越西门城外练祁河上的桥梁，由他题名为侯黄桥，以纪念民族英雄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他在偏中前，正为人书写对联，忽右眼失常，视而不见，家人劝止，但先生坚持抱病写完，而病已深矣。其对人对事十分负责的精神，感人尤深。所遗诗文集7卷，手稿不幸毁于十年动乱。

黄虞孙家藏古书，不下千册。每夏曝晒庭中，驱除潮气与书蠹。有破损的，必予修补或更新封面，妥善保存。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爱护，令人钦佩。现大部份藏书已由其家属捐赠嘉定县博物馆。

他还重视绿化，庭前屋后，遍栽花木。四时绿叶成荫，花开不断。尤爱菊花，每年种百余盆。凡扦插、上盆、灌溉、施肥、整枝、除虫、芟草等，都亲自动手（晚年由子女帮助）。公余之暇，徜徉其间，怡然自得。他熟悉菊花品种，一看叶片，便知其名。曾试用皮丝烟液治蚜虫，得良效。又收集花籽，种后得新品种，摸索出扩大品种的途径。每届深秋，菊花盛开，庭前点玉浮金，冷香淡艳，益增雅兴，清晨薄暮，留连花间，几至废寝忘餐。其爱菊之深，可以想见。

杨卫玉生平简介

陆象贤

杨卫玉(1888年~1956年)字鄂联,嘉定县人。毕业于上海理科专修学校、上海尚贤堂书院。

1911年12月31日,杨卫玉与张研异等在嘉定存仁堂开会筹组以监督行政为主旨的共和协会,1912年2月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会长,挑选人员下乡宣讲,3月与公民社社长钱江发起筹组革除夫束期成会,4月正式成立,推选黄守恒为会长,5月发动600多人联名呈请都督永远割除夫束旧制,改章征粮,以除秕政。6月共和协会并入戴思恭等组织的共和党嘉定分部。

辛亥革命后,在江苏省办小学校,施行新教育,倡导女子职业教育。曾任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1916年9月,在嘉定组织儿童会,研究儿童玩好心理的比较、体格及学力的比较,群居心理的比较,改进私塾。历任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苏州女子职业学校主事。1920年1月他在南翔发起组织以发挥平民精神,实行文化运动为宗旨的振学会,4月举行成立大会,5月出版振学会月刊,省警务处认为振学会“与共产主义趋于一辙”,被省署训令取消。1921年,应黄炎培之邀,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任副理事长、总干事,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各项事业的创建、扩大、发展出力甚

多。192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派他至日本考察教育。从辛亥革命后至全国解放前，曾兼任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工商专科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私立女子中学、位育中学、南翔苏民职业学校以及重庆、桂林、昆明等地30多所学校的校董、校长、董事、董事长等职务，他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著名教育家。

“九·一八”后，国难日亟，杨卫玉痛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研究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在上海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所组织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负责救济战区难民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国讯》在重庆复刊，他任编委、副社长。《国讯》的宗旨为：干救国工作须有1.高尚纯洁的品格，2.博爱互助的精神，3.侠义勇敢的气概。4.刻苦耐劳的习惯，5.正确进步的思想。1943年先生与黄炎培、张志让创办《宪政月刊》，主张宪政实施即为提高民族的地位，发挥人民的主张，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学校、工厂分批内迁广西、重庆、昆明等地。培养出大量的建设人才，他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权违背人民意志，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杨卫玉为了反对内战，谋求和平，主张民主，于1945年12月，与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组织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负责分支会组。1948年4月，《国讯》被国民党政府宣布“有替共产党宣传罪”，勒令停刊后，他筹备创办《展望》，并任编辑。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会，他出席会议。会议决议赞成中共筹开新政协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向中共阐明民主建国会的决议。1949年7月，他

被选为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代表之一，前往北平。8月23日，民主建国会发表《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驳斥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答告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他参与其事。24日，中共毛泽东主席致函黄炎培，对民主建国会的声明给予很高的评价。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推选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1954年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积极参加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6年1月30日，杨卫玉出席全国政协会议，高血压病发，31日坚持到轻工业部出席生产工作会议，病情加重，2月1日入北京医院，医治无效，3日凌晨1时10分逝世。

（据《新嘉定大事记》、《悼词》、杨皓华：《杨卫玉生平简介》、《黄炎培年谱》、《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史话》等有关资料整理。）

戴伯行传略

印 克

戴伯行，名思恭，号敬庵，又字伯寅，以字行。生于1872年

(同治十一年),世居嘉定西大街,清末廪生。辛亥革命,嘉定光复,曾任嘉定县民政部副部长,协助部长许苏民总理嘉定全县行政事宜,后改为嘉定县民政署,兼任总务科长。1912年共和党在嘉定成立分部后,戴思恭参加了共和党。1913年和1918年当选江苏省省议员,1915年10月当选国民代表赴省投票赞成变更国体。1918年7月当选众议院候补议员,1920年8月当选市教育会会长。1921年6月,担任嘉定县续志总纂,拟具条例开始征访,从事编辑,但地方多故,人事不常,未果而罢。从此在嘉定以共和党为号召,曾任嘉定城市总董。为启良小学,首任校长,并将学校右边的明代尚书龚弘的秋霞圃古园修建一新,前后筹划经营数年。又发起重修有倾毁之虑的嘉定金沙古塔。

城厢老街原系石板铺成,下水道淤塞,天雨积水,路面坎坷崎岖。当时人力车已兴起,时有翻车事故。1921年由戴伯行发起整修,将路面石板易建成下水道,改为弹街路面,从此城内东南西北4大街,车行安全,步行方便。嘉定县东半县干河练祁、新泾、蒲华、华亭诸河,受潮汐影响,必须10年一修,否则涝年不能泄水,旱年不能进水,农业不能保证五谷丰登。戴伯行向政府力争经费,发起兴修水利,以冀旱涝不成灾。对地方公益,如存仁堂的施诊给药,育婴堂的抚育弃儿,都参与其事,还力倡办理救火会,东南西北中,都有“洋龙队”组织,及时扑灭火灾。

1924年9月,江浙二省军阀交战于浏河、嘉定、黄渡等处,使嘉定南乡、西乡、北乡,均为战区。嘉定城乡,民不聊生,携男带女,弃家逃难,地方秩序大乱,戴伯行组织地方热心人士成立维持会,将战地难民疏散,大部派船运往上海,推动旅沪

富商组织难民收容所,免费供给膳宿,有病施诊给药。年底战事平息,难民由沪遣返嘉定,缺粮者给粮,少衣者给衣,房屋毁于炮火者设法接济修复,其救济基金大部来自上海红十字会,由上海慈善团体大力支持,当时戴伯行负责红十字会嘉定分会。戴伯行是共和党江苏省中坚人物之一,其部下之显赫人物,有省议员侯史封、劝学所长顾端、以及戴西绳、汤从蟾、费澹山等,人称戴派党。1926年,国民党誓师北伐,翌年,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后,国民党声势大增,嘉定戴派势力遂退出嘉定历史舞台。戴伯行进上海陈绍宽的海军部当秘书兼编译处编辑,其部下大部是中小学教师,在上海创立了许多中小学,如大华中小学、三育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吴兴中学、东方中学、民生中学。国民党海军部陈绍宽去职,他亦随之离职,到市立第五中学任语文教师兼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解放以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58年逝世,享年86岁。

记堂兄水康民

水康华

堂兄水康民,字宁人,嘉定县外岗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生,伯父水履绥,据陆荪畦《外岗新志简编》记载,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在康民出生后不久,因病早亡。康民遂由伯母悉心抚养,初入外岗嚆西小学堂,后由姚姓亲戚的提引,转入娄塘

小学(当时名第十八乡乡立高等小学堂), 寄宿在潘指行校长家, 因品学兼优, 深得校长及教师们的器重。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龙门师范学校(后改名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1924年毕业, 被上海南市德隆彰烟行老板选聘为家庭教师。一年后经地方人士推荐, 由嘉定县教育局委任为西乡教育委员兼公立第四小学校(外岗中心小学前身)校长。在任期间, 聘请了几位责任心强、教学认真的教师, 使该校教育质量有显著提高, 在全县小学生算术、自然等学科竞赛及运动会上都名列前茅。1927年8月就任国民党嘉定县党部六区特别委员(注一)。不久, 因对国民党不满, 在重新登记党员时, 拒绝填表。当时他与杨保和(希时)等协助教育局长潘指行拟订规划, 首创废除教育委员制, 于1928年秋实行中心小学区制, 后为普遍推行, 他就调任为奎山中心小学校长。潘指行调离教育局后, 局长先后由毛经学(西璧)、杨师曾(拙夫)接任。其时嘉定县教育界派系之争甚烈, 康民以办学成绩突出, 被省教育厅委任为嘉定县教育局局长。不久辞职, 进大夏大学继续深造, 毕业后, 先后担任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及其附小、上海工部局东区小学、上海市和安小学教师及研究主任等职。1932年被选到南京教育部编辑小学地理教材, 同时被选去的还有我县潘昌萃(平之)编辑小学自然教材。一年后因部长朱家骅改任交通部长, 编书任务中辍, 康民随部长调至交通部航政司空运科工作, 因他擅长英语, 曾参加草拟有关国际航空方面的文件。他秉性正直不阿, 1934年3月与陆铁华等人联名并由他起草向省政府控告县第四区区长杨夏汾(镜谷)侵吞公款、营私渎职等十大罪状, 杨被迫离职(注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他将家眷安置在上海, 只身随交通部西迁至重庆。国共合作期间, 因

工作需要，第二次参加国民党。1940年因子丧妻病，家中乏人照料，辞去交通部职务，经香港返回故乡，同年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回乡后，婉言拒绝出任伪职，而与人合租六里亭附近原新生农场土地，开办辛耕农艺社，逐渐扩大规模，兼办碾米厂及粮食行。此时，外岗中心小学校舍因在抗战前期全部被毁，学校只能借用民房勉强开学，康民遂与当地几位知名人士商议后，动用原保元善堂部分地租收入，并向工商界筹募了部分经费，在现外岗中心小学校址新建6个教室的两排平房和大礼堂一幢（附有教师宿舍和灶间），还划出一部分保元堂租米，作为办校基金，按月补贴给教师每人大米4斗，使该校教师待遇高于一般公立小学，从而安定了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情绪。

抗战胜利前夕解散辛耕农艺社，接任嘉定县私立勤业中学校长。胜利以后，辞去校长职务，到上海市教育局任督学兼《正言报》社秘书，后因愤于时政腐败及人事复杂，又重回嘉定，与陆铁华等在西门经营新康酿酒厂。1947年2月，任县参议员（注三），同年11月，主编《嘉定导报》，敢于对时政公开评议，使该报为各界人士所喜爱，同时也遭县长徐竹漪等的忌恨，不久不得不停刊。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家乡迎接解放，与地方人士组织外岗应变会，经费由当地工商界筹措，将外岗自卫队枪枝集中起来，分批转交给吕炳兴及第五办事处。

解放初，康民任县工商联秘书，以民主人士身份被邀为嘉定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苏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5月，县工商联主任潘指行赴北京参加全国税务会议，由康民、廖有猷、高富龙、金桂龄等陪同前往。同年下半年，他赴北京工作，先在民航局，后转轻工业部教育处，1958

年调到广西省南宁市化工学校任教务科长。次年因患肺癌由学校派专人护送回沪治疗。1960年病逝，终年55岁。

康民学识宏博，精通英语，有关教育方面的译著较多，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美国里根所著《教育心理学》的译本，抗战前被教育部审定作大学教科用书。另一本教育译稿，送商务印书馆审定后决定出版，但该馆编辑部毁于“一·二八”战火之中，原稿也被毁失。解放后他虽年逾不惑，还利用业余时间收听广播自学俄语，并与其在大连海运学校的学生江天保合译过俄文书籍，在北方出版。

康民家境并不富裕，但乐于助人，我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师范毕业全部学习、生活费用，都由他承担，感恩终生。在他的影响下，堂兄康宇、我和我的子女多人也都踏上了教师工作岗位。

注一：见民国16年8月2日《申报》

注二：见民国23年3月8日《新闻报》

注三：见1947年2月18日《嘉定民报》

钱行素传略

陈世和提供资料

陈世雄整理执笔

钱行素，女，嘉定县纪王庙人（今属上海县），1915年（民国

4年)生。东亚体专本科毕业后,曾多次参加上海女青年会主办的各种体育训练班,及教育部举办的暑期体育教师训练班进修。对韵律活动、器械体操、技巧运动都有一定的水平。在东亚体专求学期间,学科术科并重,刻苦训练,她所参加的各种校外竞赛,成绩优异。1932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上初露头角,与同学刘静芳,及队友庄铭箴、陈宝襄代表中国队获得400米接力赛冠军。在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100米、200米、80米低栏、跳远及个人总分五个第一。她参加的上海队400米接力及上海女子垒球队也都获得冠军。当时被誉为“前无古人的运动女杰”。1935年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又获得80米低栏第一名。并刷新了她本人保持的全国记录,成为30年代国内闻名的体育健将。

钱行素不仅在国内连续夺冠,而且曾带队出洋5国争荣。1934年应新加坡篮球、排球总会的邀请,由她为队长,率领东亚女子篮、排球队前往作友谊赛,途经西贡、马来西亚、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均被邀参加比赛、或受到热情招待,各地侨胞更对我东亚健儿远征南洋感到欣慰而热烈欢迎。回国后,江西省举办第一次省女子运动会,省教育厅邀她率东亚女子田径队去南昌作表演赛,安徽省也力邀去安庆。她即率队西行,受到两省运动界的热烈欢迎,对当时女子体育运动的开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936年她从东亚体专毕业后,历任务本、明德、启秀、智仁勇等女子中学及大同大学体育教师。抗战胜利后任暨南大学、东亚体专教师。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调任复旦大学体育讲师,曾兼任1955年度寒假上海市高等学校学生田径运动学习班指导员,跨栏组由她负责指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于

1968年含冤自缢于隔离室。1978年11月21日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先父周菊忱一生简述

周承湛

先父周菊忱(菊人，鞠人)，学名永昌，字靖，嘉定县娄塘镇人。1893年10月16日出生。先祖父名周元镛，字同笙，经商。

先父早年在家就读，聪慧好学。1907年乡办新学，遂进娄塘公立小学堂初小三年级学习，毕业后适逢上海龙门师范学堂招考，有幸被录取入学。从此，受新文化、新思想熏陶，力主摆脱封建社会精神枷锁，不为旧习俗拘束，不信神，不信邪，敢于创新，在家庭、在乡里树立变革榜样。

辛亥革命那年，在龙门师范毕业后，先后在本乡母校、昆山县蓬阅乡立第一初等小学及上海万竹小学执教，凡10余年。北伐后，曾一度担任嘉定县教育局会长。嗣后因患病手术后体力虚弱，不能胜任粉笔生涯，于1923年转入上海中华书局任职员，后转文明书局任副经理、经理等职。

1930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日益加深，日货充斥市场，各方爱国志士纷纷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先父乃与王一等人艰苦创业，惨淡经营，从一个灶披间、一只煤球炉

开始，首创我国第一家生产乒乓球的工厂——中国乒乓无限公司(1927年改组为中国乒乓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出至今仍驰誉海外的连环牌、盾牌等名牌乒乓球，给当时独霸我国市场的日货乒乓球迎头一击，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逐步取代其市场。先父又资助创办《乒乓世界》期刊，宣传使用国货，配合开展体育活动，提倡和指导乒乓球运动，深受国内体育界推崇。先父自建厂开始，至1956年公私合营，一直担任该公司监事、董事长职务。

1933年文明书局撤销，归并中华书局。先父乃考虑集中精力兴办实业，因此，辞去书局工作，先后合股筹办东方照相印刷制版公司、大公机器厂等企业，并在中华珐琅厂、开美科药厂、上海薄荷公司等处参与投资，担任董、监事职务。

先父热爱家乡，深为家乡农业经营品种单一，经济面貌落后而感到不安，常以振兴家乡农业为己任。曾与各方联系，在家乡试栽经济作物除虫菊，为制造三星蚊香提供原料。1935年出任永盛薄荷公司农事部主任，配合薄荷提炼工业的成长，率先在娄塘引种薄荷。同时设立薄荷初炼工场，编印《薄荷》一书，进行技术指导。还组织提供薄荷种根，举办小额农贷，采取预约收购等办法，全力推广薄荷的栽植，终于在全县得到大面积推广，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收入。

八年抗战期间，寓居上海，从未与敌伪来往。抗日战争胜利后，主要致力于乒乓球制造和薄荷等事业的发展，曾担任中国乒乓公司董事长、上海薄荷公司常务董事。即使在事务繁忙之中，他仍时刻关心家乡建设，尤其重视家乡的教育、卫生事业，经常往返于沪嘉之间，曾应聘义务担任私立普通小学校长，为娄塘中光初级中学、娄塘卫生站的筹建，从房舍到经济，

无不全力以赴。此外，凡有利家乡建设的事，无不积极参与谋划，并力促其成。为此，曾被选为县参议员。

新中国建立后，至1956年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前，先父除仍担任中国乒乓公司董事长，上海薄荷公司顾问、常务董事外，还历任华东区公私合营薄荷原油联购处副主任委员兼经理，永华樟脑厂常务董事、董事长及上海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候补执行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先父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曾被邀为嘉定县1—6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中国经济协进会会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上海市静安区烈军属小组长（次子周承浩，共产党员，抗战期间在贵阳被国民党追捕殉难）。

他一生清白，为人宽厚，襟怀坦白，乐于助人，思想开通，有民主意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终身为国家建设、地方建设、振兴经济，尽心出力。解放后，深感新社会的优越，国家前途光明。因此，凡有号召，必先响应，平时泛读马列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幸在十年浩劫中，被冠以“反动资本家”的莫须有罪名，残酷斗争，以70余高龄，备受折磨，其子女亦多同遭厄运，终致于年老多病、精神忧伤，不幸于1972年6月14日病殁上海，享年79岁。

陈奉璋小传

梅 休

陈奉璋先生，名熙瑞，嘉定县娄塘镇人。父叔平，经营（棉）花行，家道殷实，早故。先生有五姊，仅他一男，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初二。因家境较好，得以受到民初以后新式的完全教育。幼时在娄塘两等小学校读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第四中学（即太仓中学）；读完中学，负笈于上海私立大同大学，攻英语，1924年在专修科毕业。

1927年，北伐成功，同里潘昌豫（指行）出任教育局长，委先生继严子嘉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先生在本县普通中学行政岗位上一直服务到1952年。在此漫长岁月中，因日寇侵入，两度撤离，两度复校。“一·二八”之役，为时虽暂，但校舍、设备已遭破坏；“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先生在上海，于1931年到1941年期间，任职于今淮海东路的晓光中学，为总务主任兼教历史。太平洋战争发生后，1942年夏，先生举家回里，潜居约两年半。1945年元旦，先生应同里邀约，筹办私立中光中学于娄塘镇，垫出开办费银元50枚，并将其经营之娄塘教育实进社房屋划出一小部分作校舍，（即娄塘中心小学校舍），先生自任校长兼教英文。是年8月，抗战胜利，先生即去嘉定私立勤业中学继郁冠藜任校长，作为县立中学复校的过渡。时勤

业中学已办高中，所有师资、学生、校具设备，统归复校后的嘉定县立中学。解放后先生留任到1952年，旋调至安亭中学任教。1960年，先生因年老体弱而病退，晚年居上海。解放后曾任历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后又聘为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在沪备受冲击，患肺癌，又无法进医院治疗，不幸于1974年10月26日逝世，终年74岁。

纵观先生一生，可谓平淡无甚曲折，始终坚守在本县中学行政岗位上，但也有值得称道的如下几点：

先生从事教育，实心任事，为县立中学打下坚实基础，以师资而论，并不很充实，数理化教师除倪仁伯外，均系外聘，文史地方面，如吕云彪（舜祥）、杨展成、潘秉之诸位，均系本县人，都能和先生合力办学，踏实工作，校风诚朴。解放后本县籍有些杰出人材，其初中阶段，莫不受到过培养。

先生又善理财，县立中学基础虽由县财政拨给，但如现之解放楼（原称锦生堂）实由先生向校友宣宝濂募捐兴建。先生喜爱图书报刊，私人藏书之富，在全县也属有数的。他在校中也注意扩充图书馆，撙节开支，并将历年积余，购置书籍，至今多于其他学校。

先生早染旧民主思想，治校对教师、学生并不专横顽固，形成融洽舒畅的气氛。解放前以县立中学校长地位，周旋于本县政界，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得以暗中抵制国民党特务势力侵入校内。先生内弟黄渡夏清祺（名采曦）烈士，是早期共产党员。解放前夕，校内有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本县的顺利解放，甚有关系。

先生也热情支持娄塘文化教育事业，创办中光中学已如前述。北伐革命之际，娄塘青年成立“青光剧社”；“娄塘教育

实进社”社所之筹建及成立后的管理；“嚆北青年协会”及《嚆北》的编行，都得到过先生的支持。对地方后进，先生也多方奖掖。

先生在抗战前也支持吕云彪主编的《嘉定新声》，间或为之撰写评论。他对英文造诣甚深，抗战前，县立中学校友办的刊物《雁》，先生曾翻译世界名著《简·爱》，连续刊载了2、3期，抗战起，停刊，惜未译成全书。

缅怀本县教育界先辈，略撷拾先生平生事迹如上。知人论世本不易，这不过是想说，一县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得有今日规模，主要靠解放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而前此稍有厚实的基础，先生又出过力，经历过来，也不能说毫无涓埃之献的。

锡剧著名演员——濮阳

赵振威

前嘉定锡剧团团长濮阳，是锡剧界的著名演员，在嘉定人民的心目中留着深刻的印象。

濮阳于1920年农历正月初十，出生在江阴县长泾区赤岸乡长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濮水泉。7岁，由他父亲送往离家3里外的北涸镇连墩小学读书。3年后家中衣食无着，只得辍学去帮人家放牛。

1931年，家乡无法生活，全家搬到无锡西门外藕塘桥埭上火叉浜，搭了一间窑洞式的草棚容身，租种4亩客田。不久因收成少，交不出租米，又被地主收回租田，只剩下几分薄地。濮水泉每天帮着父亲种菜、卖菜。他有个给婚丧喜庆人家当吹鼓手的远房娘舅，因此他也学会了吹唢呐，经常跟着去当吹鼓手，每次赚几个铜板回来贴补家用。

水泉17岁那年，日寇入侵。有位祖居浙江绍兴的锡箔庄工人，全家避难到水泉居住的前村，见他手脚勤快，五官端正，愿意将四女爱仙许配给他。经双方家长作主，于次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由他父亲合会100元，为水泉和爱仙完婚。从此，一家人虽然生活清贫，倒也感情融洽。

可是好景不长，当年6月，乡下要抽壮丁，水泉册上有名，全家焦虑不安。他想到前村老艺人缪秀金，一直在外唱戏，在她逃难回来时，曾表示愿意收他为徒，既然现在走投无路，何不就此逃出去，跟她学唱戏。于是，准备了简单的行装，和爱仙一起深夜逃出乡间。

在苏州阊门外小玄妙观的民众戏院，水泉正式投拜缪秀金为师，就在18岁那年开始了从艺生涯。业师给他改名为濮惠芳，爱仙也随着改名为濮惠英。他在家时会拉拉胡琴、敲敲板，就被安排在乐队里边看戏，边跟着操琴或敲板。凭着他读过3年书，会写几个字，看戏时用心记住唱词，散戏后写在折子上，待以后老师唱到同样内容时，再加以校对订正，悉心钻研。

一次，在苏州高桥头茶馆里演出《双珠凤》中的《送花楼会》。快开场时，饰文必正的小生演员不知去向，正在紧急关头，他就自告奋勇愿意替代，得到师傅缪秀金的应允，首次登台演出。由于他年轻英俊，嗓音条件好，竟博得好评。从此，

开始断断续续地唱小生戏。两年半后，繆秀金为了使他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意让他离开自己，独自到乡班里去唱正场小生。

1942年，濮惠芳离开乡班，去常州西区戏院演出。为了适应市区的要求，除借钱添置几件演出用的褶子外，并投拜擅演小生的陈玉良为继帖先生。从陈玉良那里又学到了不少表演艺术，并学会了《花园赋》、《金殿赋》等很多“赋子”。后来由于演出水平不断提高，在常州、无锡、苏州一带颇受观众欢迎。

濮惠芳平时生活俭朴，一不爱酒，二不嗜赌，一心认认真真唱戏，指望将来有个好成果。然而旧社会的艺人，尽管他处处安分守己，仍难免常常惊慌不安。一天，戏班在无锡庙上阎王街演出《祝英台吊孝》，由他爱人扮演祝英台，当地一个恶霸见她年轻，有几分姿色，扬言夜里要抢她去当小老婆，后来得到前台老板的帮忙，风波才算平息；有一次戏班到江阴顾山镇乡下演出，当地恶霸陈宝康，故意作弄，叫演员跳加官、唱小调，直到把所有小调都唱完了，还不罢休，并把汽油灯全部敲光，硬逼着演员当夜离开陈家巷。演员们无奈，只得饿着肚皮，含泪挑着用具，连夜走到无锡。……诸如此类受人欺凌的事不胜枚举。他日夜盼望能有一天，让艺人安安心心唱戏，太太平平度日。

企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9年4月24日常州解放了！濮惠芳看到满街的解放军，纪律严明，既不惊扰百姓，也不到戏院里捣乱，觉得世道确实变了！同年8月，他所在的芳和林记剧团与殷宝童的剧团合并，取名星艺锡剧团。他认真地参加了当地政府为提高艺人素质而举办的政治讲座，学习《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发展史》，连续一年半时间，每周两

次，来回走6里路，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雪，从不缺席或迟到。1950年，苏南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剧团排出了新戏《贫女泪》，在无锡市戏曲竞赛演出中，他荣获演员一等奖，并获得剧目二等奖。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剧团又演出大型现代剧《大义灭亲》，荣获当地政府的特等奖。这时他身为剧团副团长、工会副主席，力求自己的演出能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1952年8月，全团参加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苏南地方戏曲集训班，濮惠芳担任班委委员兼第二中队副中队长。在集训班里，他回顾自己的遭遇，觉得能有今天的新生，全靠党的英明领导，共产党就象太阳一样，给予艺人无限温暖。于是，便改名濮阳；他爱人濮惠英改名为孙洁。

集训班结束后，星艺锡剧团被分配到嘉定县落户。他们带来了传统戏《梁祝》和现代戏《翻身姐妹》，但是嘉定人民平时喜爱沪剧和越剧，对锡剧感到陌生，加上当时星艺锡剧团非常穷困，设备还不如南翔镇上的业余剧团，很难打开局面。后来濮阳与团内业务骨干商量，及时排出《美猴王》、《闯王进京》和《秦香莲》、《西厢记》等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送戏下乡，才使业务情况大为好转。

1953年5月27日，濮阳担任星艺锡剧团团长，为了演好日夜两场主角和安排全团工作，常常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但是他却越干越有劲。同年8月，他亲手将一份入党申请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功夫不负有心人。濮阳他们的努力，终于使他们演出的锡剧逐渐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当地人民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955年6月，政府进行民间职业剧团登记时，经同意将星艺锡剧团改名为嘉定县锡剧团。次年5月3日，濮阳光

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濮阳率领剧团经常深入农村为农民服务，提出了“一根扁担两条腿，送戏上门为农民”的口号。订了不上酒馆、不上饭馆、不上茶馆的“三不上”和住在农民家里不挑满水缸不走、不搞好清洁卫生不走、不还清借来的东西不走的“三不走”纪律。因此，被农民亲昵地称为“我侬农民自己的剧团”。他还经常带领大家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劳动，体验农民生活，因而使他在1956年4月松江专区地方戏曲会演时，饰演《漳河湾》中农民刘旭东一角，表演逼真，曾荣获优秀演员奖。

1957年江苏省举行戏曲会演，剧团去南京参加演出了传统戏《孟丽君》。濮阳饰演的皇甫少华，虽然戏不多，由于他的成功演出，荣获了演员二等奖。

1958年4月，嘉定划归上海市。10月间，剧团去市区瑞金剧场演出家庭伦理剧《寻儿记》，濮阳饰演周子卿的有关唱段，被中国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接着，他在主演的传统折子戏《元宰认母》及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中，有关唱段也先后被灌制了唱片。由于他音域辽阔，音色高亢清亮，音质醇厚朴实，运腔流畅自如，并能根据剧情需要，时而深沉隽永，时而激越奔放，因而在锡剧同行中自成一派——“濮腔”，深受赞誉。

1959年3月底，濮阳在上海长宁区工人俱乐部演出。一天下午，接到市文化局演出处电话：有重要任务，要他和林月珍以及部分乐组成员作好准备。夜戏散场后，专车把他们接至锦江俱乐部，参加正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预备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联欢活动，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第二天的晚会上，濮阳和林月珍为党中央领导同志演唱了《双推磨》选段，博得了热烈鼓

掌。临走时，周总理还亲自送他们到门口，濮阳为此激动万分，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一个普通艺人，新社会里竟得到如此厚遇。每想到这件事，更使他增添了为人民演出好戏的力量。

濮阳为了提高剧团演出水平，在排演大型革命斗争剧《六里桥》和大型现代剧《五凤展翅》时，特地邀请外单位导演和舞美设计、灯光设计等来团指导；演出后又吸收各方面意见，对剧本进行修改。经过专家们的辅导，全团表演艺术得以不断提高。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濮腔”，经常向对声腔造诣较深的专家们请教，特别是他学习了上海歌剧院声腔专家吴少伟的气功练声法，把科学的发声和传统的丹田唱法结合起来，使他的嗓音越来越圆润、响亮。

1960年，濮阳40岁，正是他舞台艺术成熟的黄金时代。他深感人才建设的重要，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用集体积累办了一个学馆，招收学员40名，这些学员得到精心培养，不少人先后成为剧团的主要骨干。

1961年，在濮阳的倡议下，上海的红旗、青浦、金山和嘉定4个区、县剧团联合演出优秀传统剧目《珍珠塔》上、下集，以扩大锡剧在上海广大观众中的影响。濮阳饰演《初见姑》、《赠塔》和《二见姑》中的方卿，由于他演得层次分明、入情出戏，并以他音色甜、底气足、吐字清、咬字准的特点，每场演出，都使观众为之倾倒。

1963年4月，濮阳被特邀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文联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并在闭幕式上介绍了文艺如何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经验。此后，他亲自抓剧本创作，鼓励编剧辅导群众文艺创作，从群众中吸取养料，取长补短。锡剧小戏《姑嫂

练武》就是将业余创作的说唱改编而成的。1965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将它和嘉定县锡剧团为农服务的先进事迹编辑拍成艺术片,发行全国。

正当濮阳带领全团成员在艺术道路上迈步前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濮阳被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关进牛棚。从此,身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剧协上海分会常务理事的锡剧著名演员濮阳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利。1971年6月,张春桥等人一声令下,嘉定县锡剧团和其他区、县剧团一样,被解散了。濮阳被安排到城东卫生院担任挂号、管理中草药。两年后,才把他调到县文化馆,负责锡剧小分队的演出,总算又有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1976年4月27日,濮阳因高血压导致半身瘫痪。但他仍顽强地坚持锻炼,2年后终于拄着拐杖站了起来,继续上班。

粉碎“四人帮”后,嘉定县锡剧团于1978年11月获准复建。鉴于濮阳的健康状况,让他担任副团长;1980年下半年,退居二线,任剧团顾问,但他仍跟着剧团巡回演出,进行艺术指导,关心演出质量。

1980年11月20日,濮阳刚随剧团返回嘉定,晚上在家里收看审判“四人帮”的电视,情绪过于激动,脑溢血症复发,经抢救无效,于24日凌晨0点25分不幸逝世,终年60岁。

企业家童受民传略

殷家纶

童受民，名传中，1902年出生于嘉定县钱门塘镇的书香门第，7岁丧父，家境贫寒。1915年小学毕业后，由其四叔资助考入江苏省第一商业学校，1919年夏毕业后，进入其四叔创办的浦东电气公司（以下简称浦电），襄办会计、文书和有关业务。

1922年应邀兼任母校簿记和会计学教员，次年又应中华职业学校之聘，兼任簿记和会计学教员，每晨赴校授课两小时，课毕立即渡江至浦电办公。同时还参加美国和万国函授学校进修会计学，取得会计师证件。曾编写《高级商业簿记》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遍销全国，颇受欢迎。此外，每年有外地几家电气公司聘请年终查账。1926年底，由于浦电业务渐繁，不得不辞去两校教职，一心专任浦电工作。1927年起，担任浦电副经理兼总务科长。在浦电初办的6、7年间，浦东还是一片荒凉地带，长达数十里的江岸，几乎全为洋商占据，在洋商产业后面，多为码头工人集居的棚户区，生活贫苦，无力装用电灯。至于乡镇农舍，稀疏分散，人烟寥落，市面萧条，因而用户不多，只能先后吸收一部分中小电力用户。浦电因机量小，线路长，用电少，以致成本高昂，得利极微。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加强管理，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厉行节约，终于取

得综合平衡。当时其四叔童世亨担任总经理，因兼营铸丰搪瓷厂，只过问公司的重大决策，具体工作都由童受民日夜操劳。

童受民担任副经理后，首先从加强管理着手。亲自召集有关科室，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在每个规章制度执行前，必亲自召开全体职员大会讲解规章内容，要求每位职员认真学习，熟悉内容，然后正式公布执行。由于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方面有条不紊，奖惩分明，调动了职员的积极性，因而都能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同时，他采取各种办法来推广业务，如实行贷款装灯，出租电风扇、电动机等办法；另外还采取登报宣传，在黄浦江边装置霓虹灯广告牌，派员游说、招揽、组织参观访问等措施，以引起企业界到浦东开设工厂的兴趣，因而营业蒸蒸日上。

童受民始终用人唯贤，虽亲不避，务使各抒所长，克尽其责。他经人介绍聘用了一位善于社交和会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胡汉明当营业科长（现在已是美国百万富翁），经过胡汉民多方与洋商游说，先后有部分原来自己发电的洋商企业改由浦电供电。至1937年浦电供电线路总长达400余公里，大小用户达1万余家，供电最高负荷接近5000瓩。

国民政府中央建设委员会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在评比全国民营电厂时认为浦东电气公司“堪称全国民营电业之楷模”，连年颁发荣誉奖状，以资鼓励。

随着经济的发展，童受民深感公司发电容量太小，若依靠同业购电，非但经常受到种种限制，而且成本也高，唯有设法增加自己的发电容量，才能降低成本，转被动为主动。得到总经理的赞同，经董事会通过，成立新厂筹建处，1936年在上海

县王家渡购地，向英、德两国订购5000瓩锅炉及汽轮发电设备2组，计划1938年建成发电，由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而作罢。

浦东沦陷后，童受民与总经理都不愿与日本侵略军合作，带领所有人员全部离撤浦东，在法租界设立临时办事处，亲自督率部分留用人员办理债权债务清理事宜。

童受民的精明强干在电气事业中早已闻名。1938年3月他在汉口由国民政府中央建设委员会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恽震引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时，即被委为该会专门委员，并派在电业处工作，继由电业处长陈中熙引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1939年3月翁、钱二位在重庆调童受民任秘书处代理主任秘书，兼任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我就在财务委员会工作，所以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3个月后童受民忽患胃病，体力不支，抱病工作，于9月初准假回上海休养。实际上是由于秘书处一位机要秘书，经常越职行事，兼以后台较硬，童受民对此非常气愤，但又无能为力，因而借病离职。1941年1月，他重返重庆，适值资源委员会筹备成立甘肃油矿局，派孙越崎为总经理，童受民为财务处长，在孙总经理驻矿期间，由他代行总经理职务。但因胃病复发，于1942年底再度准假回沪疗养。实际上事出有因，当初筹备成立甘肃油矿局时只有总经理孙越崎、一位秘书、童受民和我4人，后来，发展到办公人员3、4百人，都由各方面推荐，良莠不齐，帮派众多，他看不惯官场习气，故又借病离职。1943年3月应老友唐经绶邀请，经董事会通过，推他任中南电业机器厂经理，至1945年5月，因病势严重，入院进行胃切除手术，出院后回家休养。

1945年9月，上海华洋各公用事业公司在市公用局统一领导下，接收被占财产，分别复业。华商电气公司董事会推杜月笙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童受民经公用局长黄伯樵推荐，被董事会聘为经理，负责公司内外实际工作。浦东电气公司仍由童世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两公司被日本侵略军强占8年，疮痍满目，破坏不堪。他早已知道华商电气公司在战前积习甚深，但以其基础较厚，地域优越，认为如能改善管理，大有发展前途，故毅然负起经理重任。孰知其中某协理仗着帮会势力营私舞弊，敲骨吸髓，巨细不遗，不择手段，排斥异己，导致歪风邪气笼罩公司上下，正气无法抬头。他见事不可为，屡萌退志，于1946年9月底坚决辞职，10月份开始不再到公司上班。

1946年8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奉翁文灏命，来沪邀请他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欣然与孙拯搭美机赴日。中国检察官要求他用英语发言，坚辞不获，乃先拟就证词，因法庭不许携带文稿资料，只得背诵纯熟，以免临时疏漏。8月26日他准时出庭，供证日军强占8年中，浦东电气公司所受财产上及营业上损失情况。在发言过程中遇到日美辩护律师不断插词质询，童受民以镇静的态度，用流利的英语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质询，虽然不辱使命，但他对未能用中国语言发言，深感遗憾。

抗战前在浦电长时期的实践，和抗战时期在官场中的一些经历，使童受民体会到办好一个企业的关键，最主要的是重视企业管理，同时要增强技术力量，才能使企业蓬勃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抗战胜利后，他除继续加强企业管理外，还广

招人才，使技术人员从抗战前的几名发展到几十名，全部充实到各个部门。由于他用人重才和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同时由于技术力量的增强，对输供电线路及变电所进行技术改造，挖掘潜力，灵活调度，增添发电量（包括租用各大厂自备发电机组），到解放前夕供电最高负荷比战前约增长一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童受民仍连年加强建设，积极经营，改善管理，为迎接日后国家统一经营作好准备。

解放初期，童受民顾全大局，把公司里的大批技术人员支援到国家重点建设单位。留在公司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后来都分派到各电业部门担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954年7月浦东电气公司在童受民带领下，最早响应号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改为公私合营浦东电气公司，他被任命为公司经理。1956年1月被调任南市发电厂副厂长。1963年8月（62岁）退休。

解放后，童受民曾连任五届东昌、蓬莱、南市3区的人民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童受民横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83年11月21日童受民因病逝世，终年82岁。

陈梦渔简介

周礼德整理

陈熊，字梦渔，以字行，嘉定县方泰镇人。1895年4月25日生。少时就读于方泰泖溪小学，1906年考入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附中，毕业后，升入该校航海科。后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航海科迁吴淞独立成校，称交通部高等商船学校（上海交大前身），他随之转学。毕业后在招商局实习，其时局中高级海员均系英国人，对实习生时有欺凌侮辱行为，陈梦渔秉性刚毅，常与英国海员发生争执，为不甘受人歧视，毅然放弃航海，投身“教育救国”之途。为了实现其意愿，加强办学能力，充实教学知识，又入上海龙门师范，专攻教育一年，毕业后，便踏上了艰苦办学的漫长征途。

1918年秋，陈梦渔邀同庞醒跃等4人，在上海创办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初任兼课教师，并代理校务，1929年起担任校长，直至1951年该校在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并入华东师大体育系为止，达30多年。该校共办本科46届，毕业学生1500余人，连同高中体育师范科和童子军训练班各届共3000余人，前后培育了大批体育教学骨干和运动健将，为我国体育运动的开拓和振兴，作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陈梦渔还先后创办了立群女校（1921年）、东亚

中学(1936年)、凌洲中学及纫芝小学暨幼稚园(1938年)。抗战期间,为收容受难儿童入学,还创办过难童学校,上海沦陷时被解散。在他立志兴学的数十年中,不仅兴办学校,还亲自任课,历任国立暨南大学训育主任、校务委员,江苏省立第二师范、上海市立务本女中、中华职业学校、大同大学、新华艺专、中国女子医学院、震旦大学等教职。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任他在上海法租界为该部驻沪办事处秘书,他一不就职,二不领薪,但对该处有关抗日及办学活动,均乐尽义务,先后协助该处创办了晓光、肇光、育德、思源、大光5个特种立案中学(即暗示为国立中学),他担任校董,并举办了不少短期小学及民众学校,以扶失学青年。

“八·一三”抗战后,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进驻租界,因东亚体专师生宣传抗日,学校被查抄,存款被没收。又因他曾组织童子军战时服务团救护伤兵;协助教育部在上海创办特种立案中学;救济沦陷区失业教师和失学青年,遭日军搜捕,并拘其岳父为人质。至此,陈梦渔已不能继续在上海安身,办学事宜,被迫中断。

1943年,陈梦渔潜赴重庆,任中兴实业公司副经理兼总务处长,并任全国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沪童中学校董等职。

抗战胜利后,陈梦渔返回上海,任上海市国民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积极筹办东亚体专、东亚中学、凌洲中学等校的复校工作。当时,原中兴实业公司股东大多已成为闸北水电公司董事或监察,陈梦渔应邀任商办闸北水电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秘书室主任,兼顾三校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公司要求专一任职,陈梦渔在经济上也感周转乏力,因而凌洲中学停办;东亚体专先后由束逸民及黄

狮任校长，陈梦渔为校董，至1951年并入华东师大；东亚中学则于1951年与他校合并为新力中学。至此，他数十年的办学过程，宣告结束。

陈梦渔在辛亥革命前夕，肄业于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航海科时，因校中自有枪枝弹药，曾与同学组织学生军，参与光复上海和江苏各县的活动，后又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因而很早就参加了国民党，历任区分部书记、区党部监察、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委员、中央党部检定合格的大学党义教师、训育主任，1937年夏曾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受训，抗战时在上海协助发展沦陷区抗日地下组织，1946年任嘉定县临时参议员等。并曾由钮永建、邵力子两人作证，经国民党勋绩审查委员会通过为“革命功勋”党员，从政时以简任职任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曾被判反革命罪服刑，于1975年12月15日获释。恢复公民权利后，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宝山县支部成员，并曾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分会聘为上海市体育文史委员会委员，撰写过多篇资料，其中《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沿革》刊载于《上海体育史话》第一期；《辛亥革命时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军》刊载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1985年1月30日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鉴于陈梦渔在上海解放前夕，在闸北水电公司工作时，曾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对其政治历史问题，按“既往不咎”原则，给予撤销原判，平反昭雪。其旅居美国的女儿，屡邀他去美定居，都被他婉言回绝，其恋恋于祖国之情可见。

1986年11月，陈梦渔因胃出血病逝。

（据陈梦渔生前提供资料整理）

毛齐华简历

陆象贤

1903年12月13日，毛齐华出生在嘉定县城西现龙桥村一个贫农的家庭，原名毛品贤。

1920年因家境贫穷无力升学，到上海学印刷。1923年参加了印刷同业公所（原始性工会）的活动。1925年初，与徐梅坤、郑复他等中共党员一起，发起组织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并担任副总务长。1925年2月加入共青团，同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五·卅”期间，先后领导了印刷业的“五·卅”大罢工和8月的经济大罢工，并积极参与正式成立上海印刷总工会的组织工作。同时和倪扰天、陈豪千创办了我党早期的“地下印刷厂”，印刷中央机关刊物，承印《响导周报》、《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书刊，保证了这些刊物及时出版。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时，任校联共支部局委员。

1930年回国后，与李强等人一起负责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工作，克服重重困难，沟通上海中央局和苏区中央及苏联共产国际通报联系。1936年秋，从上海到陕北，在陕北撰写的《目前白区政治斗争新形势》一文，鼓舞了苏区干部的斗志。随即与邓颖超同志一起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白区工作部任

秘书，为开展蒋管区工作准备力量，举办了白区工作训练班。西安事变以后，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蒋管区大批青年涌向延安，他接受张闻天的指示，对来参加抗日的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做了大量的接待和思想工作，分别送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或党校学习，并担任了《抗日战争中民众运动》课程讲授。193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1938年任边区总工会主任兼抗敌后援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1939年秋，转华北敌后根据地任中共晋东南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晋冀豫边区总工会主任、党委秘书长兼太行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敌占区工作部部长等职。在敌后倡导了“工人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的新劳动运动，在彭德怀的直接支持下，领导了工人群众的反扫荡斗争，保护了工厂的技术力量，使反扫荡胜利后能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最困难的1941年到1942年期间，编写了《苏联工人生活》这本小册子，使处于残酷斗争环境中的根据地工人看到革命的前途。又写了一本《论革命工厂中的职工问题》，阐述了战时根据地工厂的性质、任务及工人地位和使命等。这本小册子成为当时太行区工运思想工作重要教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是中共上海市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以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工人协会的名义发表文告、宣言，发动工人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领导了上海工人刊物《生活知识》、《劳工通讯》的出版工作。

解放后，担任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长期担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在任职期内，经常深入基层，到工矿企业做调查研究。关心工人的

安全生产,采取了有效的劳动保护措施。在刘少奇、李立三领导下草拟了《工会法》、《劳动保护条例》等立法文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审查,下放农场劳动数年。

1977年起,先后担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主席,和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任期内,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新形势下的我党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走群众路线,搞群言堂,善于与党外同志合作共事。

毛齐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工作者,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就担任共产国际《共产党》杂志中文版的编辑。1935年担任《解放》杂志的编辑。他还是我党早期培养的无线电技术工作者,1930年就土法上马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亲自培训报务员。也是中共早期的印刷技术工作者。

1983年卸任后,他仍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经常到农村、工厂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情况,特别是热心为杭州市这一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的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奔走,在西湖的保护,中东河改造,立交桥的建设,整形医院筹建,老干部医疗设施,退休工人活动场所等项目中,做了不少调查、疏通与支持工作。

补记

1938年4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齐华(即毛齐华)的《抗日战争与中国职工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团结,作了精辟的阐明。他回答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是不是仅在一个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之下统一其行

动，还是同时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的问题。他回答：“不仅需要有工人参加抗战动员的自由，争取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实现工会民主，改善最起码的工人生活等做共同斗争的纲领，而且必须还要有一个坚强的统一组织，才能发挥其伟大的作用。这个统一的组织，第一，必须是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帮口，不分信仰，不分男女，只要是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和职员（只要不是汉奸），都加入这个职工会。第二，这个组织是公开的、合法的，同时由各职工、各产业、各地方的工会用民主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领导机关。”他还回答了在某些地区里有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同时又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如何取得统一的问题。他回答：“上面我已说过不分党派。职工运动的统一，不是限制工人信仰的自由。对于各党领导下的工会问题，依我的意见，今天我们工人应该积极起来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在这个基础上，将过去所谓‘老工会’、‘新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界限、成见、隔阂完全放弃，使所有工人职员都团结起来，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之下，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来动员全国工人积极参加抗战，使在抗日民族战线中，工人阶级发挥其伟大的作用，以争取彻底胜利的保证。”毛齐华同志的回答，对促进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的统一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9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工人学校讲《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总结了1921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少奇同志在撰写讲稿时，曾约毛齐华同志到自己的窑洞前的石凳上，把讲稿念给他听，一边征求他的意见，一边修改。

吴雪之

陆象贤

吴雪之，1906年出生于嘉定县南翔镇。学名吴承康，字锡之，后改名吴雪之，毕业于上海惠灵学院。

1930年，由孙寒梅介绍，考入上海国际电台，任会计处打字员，认识了秘书处秘书陈国栋。他们组织读书会、乒乓队、足球队等团体，在此群众基础上组织国际无线电台业务员同益会。吴雪之为乒乓队和同益会的负责人之一。

1932年，经陈国栋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1931年到1933年，吴雪之参加组织国际无线电台职工的3次斗争。1931年要求增加工资，取得了胜利，就组织互助储金会，使同益会进一步巩固起来。1932年要求增加工资，失败了。1933年要求增加工资，同国内电台联合进行，以报差为主，计划从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从国际电台业务员发展到报务员，从上海扩大到全国。罢工前多次开秘密会，最后决定罢工的会议是在南京饭店开的，到会职工50多人，吴雪之在会上讲了3小时话。全体同意当晚零点开始罢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从南京派人来接替罢工的职工的工作。罢工持续4—5天，形成僵持局面，报务员没有参加罢工，各地电台也未能举行同情罢工。吴雪之与陈国栋商议之后决定复工。复工

后，国际电台台长崔雁宾把吴雪之和陈国栋叫到办公室，拿出南京发来的电报，勒令“退职”。当时国际电台被“退职”的还有章国杰、王企彭，国内电台被“退职”的有陆仲涛弟兄俩和张瑞华等，被调走的有季焕林。

吴雪之在国际电台“退职”后，到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上海代理店合盛洋行当诸葆忠的英文翻译。当时共青团组织决定：一、吴雪之将退职金和国际电台职工捐款全部交给组织；二、吴雪之联系国际电台团支部；三、在外国报纸和电报中收集情报。1934年，从合盛洋行到华商元一行当国际商情翻译员，不久，又失业。

从1933年到1937年，他一直与陈国栋单线联系。陈国栋对吴雪之说：共青团江苏省委被破坏了。要吴雪之管4个团支部：一、国际电台支部，二、海关支部，三、邮政局支部，四、杨树浦区的一个纱厂和卷烟厂的联合支部。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沪东区、闸北区已成战场，陈国栋在难民收容所工作，随难民离开上海时，对吴雪之说了3件事：一、坚持工作，管好几个团支部的工作；二、陈国栋去内地找到中央关系后就和他联系；三、上海的情况复杂，不能轻易找中央关系。从此，吴雪之暂时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

1937年下半年，共青团国际电台支部团员顾留馨（曾任1937年上海赴苏州慰问被捕的七君子代表团副团长，与救国会有联系）对吴雪之说，现在可以接上中央关系。吴雪之就写了报告，不到一个月，顾留馨通知吴雪之交出海关、邮政局2个团支部的关系。又过了不到一个月，顾留馨通知吴雪之，中央有人来接关系。来接关系的是陆志仁，经过审查，吴雪之转为

中共党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委员。职委书记是顾准，领导人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刘长胜。

1938年到1940年，吴雪之在职委工作时，领导华联同乐会和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等职工群众组织的党支部和党团工作。

1940年，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派吴雪之到上海广大华行担任办公室主任，实行党的领导，配合卢绪章在重庆开展广大华行的工作。广大华行的任务是为党提供经费。

1941年初，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巽斋），将吴雪之调离上海广大华行，筹备成立又一为党提供经费的上海协鑫号。协鑫号正式成立后，吴雪之担任协鑫号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协鑫号以上海为基础，开辟上海至南京的交通线，设立秘密联络点，在南翔设立协鑫分号，吴雪之派外岗人周承谟担任经理。南翔分号业务扩大后，又派缪蔚君担任副经理兼会计。吴雪之派陆铁华到南京成立协鑫号南京分号，1942年刘晓派项克方担任协鑫号南京分号经理，由陆铁华协助。1942年3、4月间，协鑫号扩充为协泰行，吴雪之任经理，陆铁华任副经理。协鑫号南翔分号改为协泰行南翔分行，吴雪之常去协泰行南翔分行指导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1945年底，领导上决定结束南京、南翔、六合全部分行机构，将一部分人员集中到上海继续经营业务，改迁办公地点于博物院路，吴雪之名义上是总经理，实际上调回从重庆迁回上海的广大华行总行，协助卢绪章主持全面工作。广大华行由党中央委托刘晓领导。

1946年初，由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投资，并吸收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官僚和资本家投资的民孚企业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经营由美国进口的化工、钢铁、五金和向美国出口

的桐油、肠衣等业务。卢作孚任民孚企业公司董事长，卢绪章任总经理，吴雪之、李在耘任副总经理。

1948年春，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华行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吴雪之随之到香港。从1942年到1948年，广大华行向其他企业投资已有数十家，其中有银行、钱庄、药厂、轮船公司、造纸厂、钢铁厂、仪器厂、食品公司、化工原料公司等。先后在昆明、成都、西安、贵阳、衡阳、桂林、兰洲、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岛、沈阳和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在印度加尔各答、英国伦敦、日本东京设立联络机构。到1949年为止，广大华行向党提供较大的经费有5次：第一次，1942年提供韶关地下党8.5万元法币。第二次，1948年吴雪之在香港交刘晓转给港澳工委许涤新经费15万美元。第三次，1949年，吴雪之在香港给钱瑛领导的湖北和西南地区党的经费20万港币。第四次，1949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100万美金，支援东南亚的某兄弟党。第五次，1949年，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经费约200万美金。

1949年2月，吴雪之从香港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领导下，负责接管上海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准备工作。当时吴雪之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20多人，通过他们联系分布在海关、铁路、招商局、物资储备总局、资源委员会等单位的一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准备工作主要是：一、调查、收集国民党在上海的官僚资本企业的情况。如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将调查材料送上级领导。二、以写信、走访、带口信、打电话、个别交谈、集体漫谈等方式向官僚资本企业的上层人物和工作人员宣传“约法八章”和党的政策，要求他们在人民解放军接

管以前照旧供职，负责保存好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接管。并说明有功者奖，破坏者罚；凡愿继续工作者将予以量才录用。吴雪之曾与上海海关署长丁贵堂谈判。又曾走访一个纱厂的负责人，促使他下定决心，支持职工的护厂斗争。

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苏州河南区，吴雪之赶到建国西路一处联络点，把所有与他直接联系的同志召集起来，要大家把过去调查的材料迅速集中整理。他接到刘长胜通知去胶州路开会，见到了陈毅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接管的准备工作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天，他参加了在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随即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始紧张繁重的接管工作。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共同努力、密切配合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接管了官僚资本企业轻重工业70多家，交通机构10多个，贸易系统10大单位和大小银行40多家，并迅速恢复了生产和工作。

解放后，吴雪之历任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上海市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部长、党委委员、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推拿名医朱春霆

姚旭参整理

朱春霆，字维震，上海市嘉定县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一月，世居嘉定县黄墙乡吟霞别墅朱氏故居（今属方泰乡黄墙村），系黄墙世医第六世孙，家学渊源，敏而好学，1912年—1921年在嘉定东门私塾求学，15岁随其父成璈从医，17岁丧父后，改从上海南市九亩地丁树山学医，历4载，1926年学成后即在上海开业，诊治内、外、妇、儿、伤、五官等多科疾病，尤以内、儿疾患见长。时当代名画家吴昌硕因患半身不遂症，封笔多时，乃慕名求医，疗效显著。吴昌硕为此画了一幅“牡丹图”相赠，以示谢意。在此期间还曾与当时上海名医恽铁樵一起筹办上海国医馆。

新中国成立后，朱春霆曾长期为干部保健医疗工作，作出过贡献，其推拿手法，有药物难以奏效之功，因而誉满医坛；50年代初他曾多次应召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病；还为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和著名芭蕾舞家乌兰诺娃等治过病。1955年前后，上海地区小儿麻痹症肆虐，他以独特的“一指禅推拿”法治愈了不少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患者，为此名闻上海。1957年又一次应召北上为何香凝副委员长治病，香凝老人因年事过高，气血二亏、畏寒怕风，即使在夏天也要

穿丝棉裤子,当时曾经中西名医多方治疗无效,后由朱春霆给以“四诊”合参、“八纲”论治、确诊为“寒痹”症,遂根据中医“寒则热之”的理论,运用“一指禅推拿”手法,经二个多月的悉心治疗,顽痹得解,迅即康复,并得以重新支起画架,挥毫泼墨。香凝老人在欣喜之余画了三幅“红梅图”,任朱春霆挑选一幅,以作纪念。朱春霆挑了其中的一幅,廖老夫人大笑道:“朱大夫好眼力,将我画得最好的一幅选中了。”于是,当场挥笔题字,上款是:“春霆大夫纪念”,落款是:“香凝画于北京病榻中。”

1954年,当时的上海市党政领导人陈毅等,鉴于他医术高超,推荐他进华东医院任职;1956年被国务院专家局任命为中医推拿专家。1958年他作为上海市中医界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医的推拿技术及其独特的疗效,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同年在宋庆龄、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所推拿学校,并设立推拿门诊部,朱春霆出任推拿学校校长和推拿门诊部主任。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推拿学校在他的主持和关怀下,先后培养造就了500多名推拿医生,遍布全国。他在推拿学的理论和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医推拿技术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58年起,他担任华东医院中医科副主任,1962年任华东医院推拿科主任、中医主任医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推拿学会主任委员等职。1979年参加编写《推拿发展史》和修订《中国医学大辞典》;1980年参加编写《近代中医名医选》。1983年被收入《上海医学学者人名录》;1984年被邀参加拍摄科技文献电影《杏林春色——上海名老中医荟萃》;1985年被收入《中国人名词典》。

中国画名家陆俨少

钱乃之

陆俨少，字苑若，南翔镇人，生于1909年(宣统元年)6月26日。自未识字，即好绘画。中学时期，受师友熏陶，对国画产生兴趣。1926年(民国15年)王同愈由苏州迁居南翔，乃从王同愈学习诗文书画。翌年经王同愈介绍，拜上海冯超然为师，专攻山水画。入手即不为师门所囿，机抒自运。1933年(民国22年)以不能与世浮沉，入浙江武康上柏山中，栽竹莳果，以种植自给。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携家避难重庆，饱览蜀中山水。1945年(民国34年)抗战胜利，翌年春，乘木筏东归，经一个多月，亲历三峡险水，领略两山夹峙，恶滩曲折，迂伏奔流，搏击激荡的景色，对作画大有裨益。回南翔后，继续鬻书卖画。新中国建立后，被聘为南翔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南翔市公共建设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南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画成《杜甫诗意》100幅，全部山水，为中国画史前所未有的。1977年去井冈山写生。是年撰写《山水画刍议》，总结数十年从事国画的心得体会。1978年根据历年出游名山大川，绘成《名山图》16幅。1979年参加上海市书法访日代表团去日本。1980年调至杭州，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1981年去香港举办个人

画展，颇得好评，奠定在中国山水画坛的地位，与北京李可染并称“北李南陆”。旋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委，并先后担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浙江画院院长等职。由于早年精研宋元名迹，植根扎实，既擅书法，又有诗古文词之修养，加之游历名山大川，得江山之助，探古创新，入而能出，善作云走浪激之状，倡为“留白”、“墨块”等法，间作梅花，奇古幽峭，独具面目。其作品远播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应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邀请，将于1989年前去举办“回顾大展”，为活着的东方人去该馆举办个人画展之第一人。

陆俨少著有《山水画刍议》、《山水画六论初讨》、《略论中国山水画章法、笔墨问题》、《中国山水画中笔墨的问题》以及《陆俨少大型画册》、《山水画课徒画稿》等行世。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级女性华人 ——赵小兰

在美国，女性华人出任要职的，只有陈香梅一人较为著名。赵小兰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担任内阁级职务的第一位华人，她被正式任命为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

赵小兰今年35岁，祖籍上海市嘉定县，1953年出生于台湾。幼年在台北上过小学，后随父母移居美国。

她毕业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983年曾获“白宫学

者”称号，并在白宫政策制定办公室兼任助理，主管国内交通和国际贸易。

她以前曾先后在美洲银行、海外石油公司和万国宝通银行等大企业任高级职员，1986年主动辞去年薪10多万美元的美国银行资金市场企业集团副总裁职位，受聘任美国政府运输部海运局副局长。由于工作勤奋，深受部长赞赏，并获得航运界好评。因而今年1月，当原任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希基病逝后，赵小兰被推荐接替爱德华出任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

里根任命赵小兰当此重任，除了赵小兰个人的学识、才能和在海运界的声望以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重视亚洲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反映了华人在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地位已日益重要了。

赵小兰之所以能登上美籍华人从政的最高职，其主观条件也不容忽视。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教育环境良好，使她从小爱学习，爱思考，勇于奋斗。她智力超群，竞争力强，从小学到大学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她活力甚强，不满足于书本知识，注重社会活动，善于人际交往，性格活泼，思想深刻，并能注意锻炼组织才能，向为同学所尊敬。

考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取得学位，是她成功的关键之一。哈佛的学位在美国具有权威性，哈佛工商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在美国上层社会中有很势力。赵小兰的学历足以弥补非商门出生的缺陷，使她有机会涉足于上层社会，并参加相对平等的竞争。加上她工作中坚持苦干，不断作出成绩，显示出超人的智力和才能，因而受人尊重和信任。

进入白宫，参与政策制定，是赵小兰发迹的第二个关键。

一个人的成功不但需要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机遇。不但需要才干,还需要有人赏识。她毅然辞去银行副总裁的高薪职位,改入高层政府行政部门,终于为她的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赵小兰获里根提名任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后,嘉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于1988年4月1日分别给赵小兰小姐及她的父亲赵锡成先生拍了贺电。7月11日收到赵小兰小姐亲笔署名的英文复信一封。现翻译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嘉定县侨联
亲爱的先生们:

不久前我的父亲转来你们仁慈的电报,非常感谢。因为在我的过渡时期十分忙碌,回信拖延了。我接受你们的良好祝贺,我希望我能经常得到全中国人民的信赖。

请接受我对你们各位由衷的最好的祝愿。

诚挚的赵小兰

发自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华盛顿D.C.20573

(转载《上海侨友报》,略有改动。)

来函照登

读《嘉定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7页廖家初文内第2行有：“1个哥哥、4个姐姐”句，可能作者未详细知道其家中人数，或者笔误，谨将所知奉告，供参考。

廖家初就义时，在家中行八，他有1个哥哥，6个姐姐和1个妹妹。哥哥廖君嘉，已故，解放前任郑州铁路局会计处长。大姐家鉴在台湾病故，潘守之先生夫人。二姐家婉，1979年在上海病故。三姐、四姐都在四川。五姐家善，在北京，汤充士先生夫人。六姐家鲜，1983年在上海病故，胡叔常先生夫人。妹家艾，在美国，庶出。

吴师曾

1988年7月4日

《嘉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

（一）《潘指行先生传》一文第162页14行所载“1952年，经胡厥文先生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一节，据我所知，当时嘉定县属苏南行政区，潘先生参加民建是1951年经钱荪卿先生介绍，和高启华、印克两同志同时参加的。

（二）第164页《嘉定竹刻艺人潘行庸》一文末句：“曾被聘为第一、二、三届县政协委员。”我知道潘行庸当时还曾被聘为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以上两点请予补正。

廖有猷

1988年6月2日



张崇虎摄

古猗园一角

张崇虎摄

